

【论 文】

从“勤王大清”到“满蒙独立”

——川岛浪速的“满蒙独立运动”¹

王 柯

当代日本研究中日关系的著名学者卫藤瀧吉，曾经分析过明治后期以来日本社会关于中日关系认识的历史变迁过程：（1）出于对“唇亡齿寒”的担心，关心中国未来前途的日本人分为主张清国应该实施“攘夷”和主张清国应该实施“开国”两派，而最后清国开国派占了上风；（2）由于看到清国迟迟不肯放弃天朝体制，于是清国开国派又分为清国可能开国和清国不可能开国两派，而最后清国不可能开国派占了上风；（3）与其坐视锁国的清朝最终落入西方列强之手，不如由日本主动采取行动，于是不可能开国派再次分为支持征服中国和支持中国革命两派。²卫藤瀧吉对近代中日关系历史走向的这一概括，代表了许多日本学者的观点，也确实点出了近代中日历史关系衍变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特征。然而，从最初的与人为善的期待到最终采取不惜伤害对方的行动之间，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顺理成章的自然转移法则。很明显，这一观点同时有着成为替日本侵略中国进行辩护之口实的可能。原因在于它没有指出：支持征服中国或是支持中国革命两派的真正的分歧点，只是关于以何种手段才能为日本国家博得最大利益的认识上的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当年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的势力，之后甚至是当时也会积极支持日本侵略中国行为的原因。

支持中国革命与支持征服中国两派之间的区别，只是在于手段的不同。如果从手段上对支持在中国扩大日本势力范围的日本人进行分类，其实还会更多的层次和选项。大正3（1913）年2月，研究中国的青柳篤恒在《太阳》第十九卷第三号上发表的〈我日本对支那之根本方针〉（上）一文中谈到：辛亥革命发生之后日本社会中关于中国领土的舆论大致可以分为“分割论”、“吞并论”与“保全论”三种，而其中的“分割论”又可分为三种。第一种为“将南满洲和内蒙古收入我手”，第二种为“将南满洲、内蒙古和黄河以北地区收入我日本之手”，第三种为“将南满洲、内蒙古、黄河以北之地及江苏浙江地区割让给我日本”。³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领土“分割论”，首当其冲被认为应该“收入日本之手”、或者直接割让给日本的地区都是“南满洲”与“内蒙古”，也就是所谓的“满蒙”地区。青柳篤恒的分析清楚证明，20世纪以来日本染指中国边疆地区的活动，大多始于“满蒙”、即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⁴

说到日本对满洲产生侵略野心的渊源，一般都会提到佐藤信渊在其1823年所著《宇内混同秘策》中所提到的“所有经略他国之法，以从薄弱和易取之处开始为道。而于皇国而言，当今世界万国中最易攻取的土地非支那国的满洲莫属”一语。而近代日本对“满洲”产生直接关心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末它开始侵略朝鲜半岛、也即开始侵略大陆之初。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这两场与“满洲”分不开的战斗，为日本提供了大陆国家化的坚实跳板。⁵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后的《马关条约》中日本就提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领土要求。但是俄罗斯、德国与法国“三

¹ 本文为王柯著《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民族国家”、“边疆”、历史认识》的第五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137-192页）。

² 卫藤瀧吉：〈大国におもねらず小国を侮らず〉《中央公論》，1972年10月號、118頁。

³ 青柳篤恒：〈支那に對する我日本の根本方針〉（上），《太陽》第十九卷第三號，90-91頁。

⁴ 因本文多用日文歷史資料和先行研究，為尊重原資料和加深讀者印象，以及文中行文方便起見，文中的「滿洲」即中國東北地區，「滿蒙」即東北與內蒙古東部地區。以下不再一一說明。

⁵ 小林道彥：《日本的大陸政策—1895-1914》（東京：南窗社，1996年），7頁。



国干涉还辽”，使日本不得不将辽东半岛交还给清朝，然而 1900 年的“庚子事变”之后俄罗斯却占领了东北地区。“三国干涉还辽”带来的“屈辱”感，令日本对“满洲”地区的权益一直耿耿于怀。直到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才通过《朴茨茅斯合约》在“满洲”南部落下了脚跟，俄国将自己从清政府得到的旅大租借地、中东铁路长春至旅顺段及二者附属的一切权益转让给了日本。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作为觊觎大陆领土的近代日本帝国主义的话语，“满洲”却变成了“满蒙”。

这个问题当然也涉及到了清末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下展开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的问题：一个“民族国家”何以具有维持“天下”体制的合法性？1911 年 10 月-11 月间，梁启超在《新中国建设之问题》中就明确质问：“蒙、回、藏之内附，前此由于服本朝之声威，今兹仍训于本朝之名公，皇统既易，是否尚能维系，若其不能，中国有无危险？”中国如果从一个传统的多民族的帝国构造向一个近代“民族国家”转型，“满”与“蒙”自然都是可以被“中华”所放弃的“鞑虏”。但是在这一时期，“满”与“蒙”之所以被能够合为一体，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日本势力的染指所造成。正如卫藤寅吉所指出的那样，除了支持中国革命一派以外，还有部分日本人和日本政治势力为了扩张日本势力范围而参加了分裂中国的行动。本章研究的对象就是由大陆浪人川岛浪速教唆和推动的“满蒙独立运动”，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也同时参加了分裂中国的活动。

1. 川岛浪速与所谓“满蒙独立运动”的发生

出生于长野县的川岛浪速，在义和团事件（又称庚子事变）发生期间，随着他的同乡、当时被任命为日本临时派遣队司令官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著名情报军人福岛安正少将作为“通事”即翻译来到了北京。他借助于自己当年在兴亚会下外国语学校支那语科掌握的中文能力，在事变发生时成功地劝说了在紫禁城中 2000 余名清朝宫廷人员放弃笼城，因此得到了八国联军当局的信任。而被八国联军统治北京当局任命为皇宫总监的川岛浪速，又因保护紫禁城使其没有受到过多的损害，得到了清王朝的信任。之后，进入八国联军统治北京当局军政署警察部门的川岛浪速，藉助列强和日本军方的支持，在事变期间尽力维持了北京的治安，还参与设立了北京警务学校，因此在清皇室返回北京后，又被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聘用来说明建立现代警察制度。¹当时，与川岛交好的肃亲王善耆为步军统领和民政部尚书。

尽管有人对“在北京政界中川岛具有特殊的地位和相当势力”一说表示出极大的怀疑，²但是毫无疑问，川岛浪速的确得到了清朝政府高层的极大信任。关于这一点我们能够通过以下材料得到证明。1901 年川岛希望回国度假，然而清朝政府的总理衙门居然向日本驻军提督山口素臣（第五师团长）发函，请求山口出面挽留：“该员自到京以来，办理一切事宜，善体帮教，悉臻妥恰，本爵极为欣慰。若一旦言旋，诸多未便，拟请贵军门转致该员，暂缓时日，再定归期，实于公务裨益良多，不胜殷盼之至。”³作为处理清王朝外交事务的最高机关，居然会为这样一件事发出专函请求，足见清朝政府对川岛浪速之重视。

下面这件事也可以证明川岛浪速在北京政界中的地位。1908 年 11 月 11 日，川岛前往黄寺拜见来到北京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与达赖喇嘛之间有过一段交谈：“（达赖说道）从前日本和尚

¹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全宗》，《聘請日本川島教練巡捕設立學堂每月需用月俸經費若干請將合同原定數目見復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號：01-14-022-01-005，光緒 27 年 07 月 24 日（1901 年 9 月 6 日），發文人：步軍統領衙門。收文人：外務部。

² 中間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 年），第 112 頁。

³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川島君在京辦理一切事宜悉臻妥洽請轉致暫緩回國由〉，光緒 27 年 03 月 15 日；1901-05-03，01-14-010-02-004。



有赴西藏者，我曾见过，今日又与君相见，也很喜欢。达赖问，君何时到京？川岛答：到了没有几天。达赖问：从日本到北京走几天？川岛答：多则十天，少则七八天。达赖问：君先后到北京几年？川岛答：在京共八年。达赖问：闻君从前在北京曾与喇嘛往来？从前在京见过喇嘛，与谈佛教，深蒙指教。达赖问：贵国大皇帝安否？地方安否？川岛答：托福，敝国大皇帝很康健，收成也好。达赖让茶并命堪布送川岛藏枣及苹果各一盘。川岛辞出携所赐藏枣苹果去。”¹此次达赖喇嘛在北京停留了近三个月，但是能够见到达赖的日本人绝大多数为外交官僚并且屈指可数，而达赖喇嘛的随从罗桑旦增（堪布）却在川岛浪速前来拜见打来之前还亲自上门拜访了川岛浪速。²

川岛浪速曾经两次得到过清王朝的授勋。第一次是在光绪 28 年（1904 年，明治 36 年）12 月 15 日，“大日本国元陆军通译”川岛浪速获得了由清国“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奕劻颁发的“三等第二宝星”勋章；³第二次是在光绪 29 年（1904 年）12 月 4 日，“大日本国人警务学堂监督川岛浪速”再次得到“军机大臣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奕劻颁发的“二等第二宝星”勋章。⁴可见，川岛浪速在与清朝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越来越受到了清朝王公们的信赖。也正因为这种关系，企图在北京通过扶大厦于将倾的活动展示能力，以接近清朝皇族、借机为日本谋取利益的川岛浪速，很早就对野心家袁世凯抱有戒心。

按照《川岛浪速翁》一书的说法，在得知袁世凯被焦头烂额的清王朝重新启用之后，川岛浪速曾经三次组织了暗杀袁世凯的行动，企图将袁世凯杀害在从河南到北京就任的途中。其中两次还得到了在北京日本公使馆中日本陆军军官的支持，他们甚至直接参加了暗杀行动，但是却都没有取得成功。⁵1911 年 12 月 7 日，川岛浪速在从北京发给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中将的电报中谈到：“袁世凯阴谋逐渐膨胀，逼迫摄政王退位，欺负他人之寡妇孤儿，借太后垂帘之名垄断君权于一身。为盗取大清之天下，断朝廷之手足而植以自家羽翼，愈加示威于宫中、府中，毫无忌憚之处，遭到激烈反对。满人之愤懑已达其极。北京不日将化为祸乱之巷街，而其乱当自今日始也。”⁶川岛浪速笔下的袁世凯，一副活生生的小人得志猖狂的形象。这段文字，反映出川岛浪速对袁世凯借机要挟清朝皇室、逼迫皇室退位这一做法的强烈反感。然而这段话也反映出川岛浪速的立脚点，不是清朝而是清皇室。川岛浪速之所以站在清朝皇室的立场上，与他在北京得到清朝皇亲贵戚的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宇都宫太郎就认为，川岛“作为肃亲王等人的顾问得到非常信任。”⁷

为了对付袁世凯的步步进逼，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一批满清权贵于 1912 年 1 月 12 日集会，1 月 19 日组织了“君主立宪维持会”（俗谓“宗社党”），要求隆裕太后坚持君主制政权，反对共和制。他们密谋驱除袁世凯，以毓朗、载泽出面组阁，铁良出任清军总司令，然后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但是，袁世凯通过汪精卫联系到同盟会，1 月 26 日同盟会彭家珍炸死了宗社党首领良弼，宗社党遂告鸟兽散。对于袁世凯回到北京以后的各种活动，川岛浪速早

¹ 《外務部全宗》西藏檔，〈日本人川島見達賴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號：02-16-007-02-044，光緒 34 年 10 月 18 日（1908 年 11 月 11 日）。

² 秦永章：〈1906—1908 年日本當局與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接觸〉《民族研究》，2005 年第 4 期。

³ 〈製鐵所長官陸軍中將中村雄次郎以下二十五名外國勳章並記章受領及佩用ノ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10112575800，叙勳裁可書・明治三十六年・叙勳卷十・外國勳章受領及佩用四(国立公文書館)。

⁴ 〈勳六等川島浪速以下三名外國勳章記章受領及佩用ノ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10112590000，叙勳裁可書・明治三十七年・叙勳卷六・外國勳章受領及佩用三(国立公文書館)。

⁵ 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 年），116—120 頁。

⁶ 〈受七六一，電報〉明治 44 年 12 月 6 日から（明治 44 年）12 月 9 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50624100，清国革命動亂ニ関スル情報 / 陸軍ノ部 第三卷(B-1-6-1-39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⁷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 2—陸軍大將宇都宮太郎日記》，（東京：岩波書店，2007 年）。1911 年 10 月 17 日



在1月22日给日本参谋本部发出的电报中，就已经直言这是袁和孙中山在演双簧戏。¹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将中国大陆作为自己活动舞台的日本大陆浪人，基本上都对袁世凯十分仇恨。在这一点上，日本大陆浪人其实与革命党人非常接近。然而我们却不能简单地将日本浪人们对袁世凯的憎恨与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憎恨二者完全等同。因为同情和支持革命党人的日本浪人之所以憎恨袁世凯，与其说是憎恨他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成果，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明白比起革命党人来，日本从狡诈的袁世凯处必将更加难以获得他们想在中国获得的利益。更有一部分日本大陆浪人，他们既不喜欢袁世凯也不喜欢革命派，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在清王朝的统治体制下他们才能在中国有更大的活动空间。所以他们原本就没有接近过革命派，也不希望看到“革命”的发生，而对袁世凯的憎恨也是因为看到袁世凯已经成为了对清王朝统治体制的极大威胁，成为他们操纵和利用清王朝权贵的绊脚石，川岛浪速就属于后一种。

按照川岛浪速的说法，面对袁世凯的“老狻不忠”，清朝皇族中的醇亲王载沣（摄政王）恭亲王溥伟及肃亲王善耆开始密谋利用日本力量维护清王朝统治体制。与川岛浪速建立起了密切关系的肃亲王善耆，1912年1月22日晚亲自找到川岛商谈是否有得到日本的援助，藉助日本的力量逼迫袁世凯辞职离开北京的可能。²尽管东北地区的满族社会和以喀喇沁旗王为首的内蒙古东部蒙古王公表示愿意组织军队进行“勤王”，³川岛浪速也劝说日本军方向“蒙古勤王军”支持军火，⁴然而川岛也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怎么做，清王朝都逃脱不了日益走向灭亡的命运，日本方面能够做到的也仅此而已。因此他在1月29日开始策划并规劝肃亲王等首先谋求将“满蒙”地区变成一个日后再起的根据地：“组织满蒙勤王军，通过标榜无论如何都要守住祖先故土之理由保留大清之名义，暂以满蒙为根据地蓄养实力，静等民国自乱必有再出中原之时。宣统退位之罪在于奸臣和失去良心的王公们，可以替祖宗声讨此罪借此告知天下保存大清之名义。”他进而向日本说明这种做法的好处：“此一于北方兴起之国，其首脑当然明白只能靠日本的掩护才能生存。我国可以利用此点为我机关所用。所以应该尽一切可能给予援助。”⁵这应该是川岛浪速关于他策划的所谓“满蒙独立运动”构想的最早表述，但是可以看到，因为具有“勤王”的因素，直到此时还没有见到“独立”二字。

2. 蒙古王公的“勤王”与“独立”

1912年2月，在得知清王朝皇室已经决定逊位后，川岛马上开始行动，在川岛浪速的计划和具体安排之下肃亲王善耆于1912年2月2日逃出北京，由天津乘坐日本邮船渤海丸于6日到达了当时在日本控制之下的旅顺。⁶之后，川岛浪速又设计让在北京的蒙古王公逃离北京，以便回到内蒙古东部可以“举事”、“勤王”。

有趣的是，即使在1911年底和1912年初这个敏感的时点，被川岛浪速用来将“满”“蒙”两个民族集团的社会上层往一起糅合的历史和政治因素，仍然是即将谢幕的“大清”。包括清王朝在内，中国历史上由非汉族建立的王朝，大都是以北方民族为主人公的征服王朝。这些王朝，因为在进入“中国”建立政权之后认识到无法用自己“民族”的统治方式统治“中国”，逐渐都

¹ 〈附、参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五二号）同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年），141頁。

² 〈附、参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五四号）一月二十三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年），142頁。

³ 〈附、参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五九号）同日、（第六一号）一月二十八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年），144-145頁。

⁴ 〈附、参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五九号）同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年），144頁。

⁵ 〈附、参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六二号）一月二十九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年），145頁。

⁶ 波多野勝：《滿蒙獨立運動》（東京：PHP研究所，2001年），74-77頁。



会向中华王朝转化。然而，由于这些政权是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进入“中国”，最初都会与“中国”的民众之间存在严重的民族隔阂或民族对立，这使得它不得不在以中华文明方式统治“中国”的同时，又都采用了以周边的“民族”集团牵制“中国”，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征服王朝的“多元式天下”的传统。¹而在清王朝以民族等级制度为基础的“多元式天下”构造中，蒙古社会上层被赋予特殊的地位。所以，作为清王朝的一个特权阶层，在面临清王朝全面崩溃的时刻，蒙古社会上层也就对清王朝表示出了那么一点的“忠诚”。例如，辛亥革命时期，曾任任陕甘总督的蒙古人升允率旧部反抗，他曾经做过这样一首诗以表明心态：“老臣犹在此，幼主竟何如？倘遇上林雁，或逢苏武书。”²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由蒙古王公所提出的“勤王”——组织军队进军北京以说明清王朝支撑其统治体制，最初并不是出自于内蒙，而是出自于外蒙。1911年的11月8日（旧历10月10日），清王朝的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接到了（外蒙古）四盟王公喇嘛的一封来信，内称：“现闻内地各省，相继独立。革命党人，已带兵取道张家口来库，希图扰乱蒙疆。我喀尔喀四部蒙众，受大清恩惠二百余年，不忍坐视。我佛哲布尊巴呼图克图，已传檄征调四盟骑兵四千名，进京保护大清皇帝。请即日按照人数，发给粮饷枪械，以便起行。是否照准，限本日三小时内，明白批示。”³

外蒙古四盟王公在信中所提出的“勤王”条件——按照人数发给粮饷枪械，事实上是当时库伦大臣所根本无法办到的。因为外蒙古王公已于一年前开始暗中交接俄国势力筹划独立，所以说，这封信中所提出的“勤王”，只不过是为其之后进行分裂活动制造一个正当性理由。果不其然，当天晚上7时，三多再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独立的通告：“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朝恩遇，不为不厚。……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期完全。……库伦地方，已无需用中国官吏之处，自应全数驱逐，以杜后患。”⁴

不能“勤王”就要独立，从这种做法中可以看出蒙古王公们的一个逻辑：蒙古是清王朝版图的一部分却不是中国的领土，蒙古人是大清国的臣民却不是中国的国民。因此，清王朝一旦灭亡，蒙古与清王朝之间的契约关系也就随之烟消云散，而蒙古也就与中国没有了干系。鼓吹蒙古独立的人们实际上区分了清王朝与“中国”，既然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内地各省都可以与清朝政府脱离关系而实现独立，那么与各省同为大清国组成部分的蒙古，既然无法通过“勤王”的手段去保护作为母体的清王朝，那就只能与中国内地各省同样选择自保的方法，与清王朝脱离关系。然而，为什么即使勤王作为分裂的正当性根据值得引起注意。

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开中国近代民族分裂活动之滥觞。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发生，与中国政治和社会体制发生翻天覆地的剧变，二者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而与当年清王朝采用“多元式天下”的思想构筑王朝的政治构造和地域构造、而今革命家提倡和追求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思想和行动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⁵而蒙古王公之所以提出“勤王”遭拒为提出“独立”的正当性依据，还在于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政治构造曾经具备“满族联合蒙、藏、回以牵制汉人”的性质。正是因为以上关系，蒙古王公在意识到清王朝已经无法扭转灭亡之趋势的情况下所提出的“勤王”口号，实质上就是“民族独立”的前奏曲。口头上喊着“勤王”，实质上想的却是“民族独立”，内蒙古的王公们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活动，同样也是这种情形。不同的只是，内蒙古王公们的“勤王”得到了日本势力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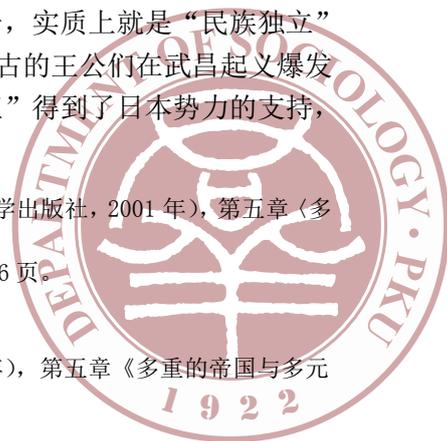
¹ 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五章〈多重的帝国与多元的帝国〉。

² 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伝》中，（东京：黑龙会出版部，1935年），第306页。

³ 傅启学：《六十年来的外蒙古》（台北：商务印书馆，1961年），28页。

⁴ 傅启学：《六十年来的外蒙古》（台北：商务印书馆，1961年），29页。

⁵ 王柯：《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台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五章《多重的帝国与多元



而外蒙古的分裂活动具有帝俄的背景。

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利用诸多档案，记述了这一时期在北京蒙古王公的活动特征。以那彦图（喀尔喀亲王、清廷御前大臣、八旗镶红旗都统）、贡桑诺尔布（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世袭札萨克亲王、卓索图盟盟长、肃亲王善耆的妹夫）、博迪苏（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博德勒噶台亲王伯彦讷谟佑第三子、辅国公、御前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镶蓝旗满洲都统兼署正红旗满洲都统）、多尔济帕拉穆（喀尔喀车臣汗部中右旗札萨克多罗郡王、车臣汗部克鲁伦巴尔和屯盟盟长）、帕勒塔（土尔扈特东部落六世君王巴雅尔之生子，袭封札萨克郡王，科布多办事大臣）为首，当时在北京清廷中有二十几名蒙古王公。¹此时这些蒙古王公们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活动特征，一言蔽之，就是激烈反对清帝退位和实行共和。

武昌起义爆发后，由那彦图、贡桑诺尔布、博迪苏为首，12月24日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又称“蒙古同乡联合会”、“旅京蒙古联合会”、“蒙古联合会”）。²12月26日以上述三人及多尔济帕拉穆为首，纠集其他24名蒙古王公，以“蒙古全体代表”的名义向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递交信函，向清王朝示忠并要求袁不要与革命派妥协，并声称外蒙之所以宣布独立是因为担心实行民主制，“倘从共和之请，代表等恐蹈库伦之续。”³还向日本公使馆表示：“若果真无法摆脱满朝灭亡、建立共和的命运，蒙古诸王族原本只与满廷相通，隶属于其，对于汉人组织之政府并无继续此种关系之义务。”⁴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蒙古王公们在同时给南方代表伍廷芳的两封信中指责革命党人为“狭隘民族主义”，而他们所提出的之所以反对导入共和体制的理由在于：“满蒙藏回……只知有君主，不知何所谓共和”，并且威胁说：“如诸君子固持己见，鹜虚名，速实祸，以促全国之亡，则我蒙古最后之主张未便为诸君子宣布。”⁵而在1912年1月17日至23日清廷召开的御前会议，之所以迟迟不能就接受共和、清帝退位达成统一意见，与会的蒙古王公的激烈反对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帕勒塔甚至声称：蒙古“惟与清廷有血统上之关系”，“一旦撤销清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⁶

蒙古王公之所以敢于声称“血统关系”，是因为多年来清王朝一直实行“满蒙联姻”的政策。而川岛浪速敢于提出组织蒙古举兵“勤王”的根据。当然，川岛浪速之所以能够向肃亲王善耆等人提出“组织满蒙勤王军，通过标榜无论如何都要守住祖先故土之理由保留大清之名义，暂以满蒙为根据地蓄养实力”的建议，既是他出于对清王朝内部政治构造的了解，也是他与当时清廷宗室、以及在清廷中蒙古王公之间建立起了相当程度的相互信赖关系的证明。因为是肃亲王善耆的妹夫，最为川岛浪速所重视的就是喀喇沁的贡桑诺尔布。

的帝国》。

¹ 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大学中国内蒙古地区党史、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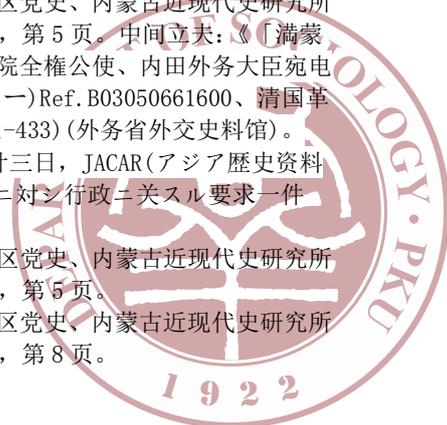
² 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大学中国内蒙古地区党史、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页。

³ 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大学中国内蒙古地区党史、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页。中间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の構図》（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第132页。〈伊集院全権公使、内田外務大臣宛電報〉第七六〇号，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50661600、清国革命動亂ノ際蒙古獨立宣言并ニ清国政府ニ対シ行政ニ关スル要求一件(B-1-6-1-433) (外务省外交史料館)。

⁴ 〈伊集院全権公使、内田外務大臣宛電報〉第七二一号，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廿三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50661600，清国革命動亂ノ際蒙古獨立宣言并ニ清国政府ニ対シ行政ニ关スル要求一件(B-1-6-1-433) (外务省外交史料館)。

⁵ 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大学中国内蒙古地区党史、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页。

⁶ 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大学中国内蒙古地区党史、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页。



由于善耆的关系，贡桑诺尔布与川岛浪速也应该早有来往。1902年春，贡桑诺尔布接受日本秘密邀请，访问日本并到大阪参观“内国劝业博览会”。在此期间他与日本朝野多有接触，并与曾经担任日本临时派遣军司令官参与了镇压义和团的著名情报军人、当时的参谋次长福田安正之间就作为“日蒙亲善”的一环而在内蒙发展近代学校教育一事达成了协议。在归国途中，他又向日本驻清国公使内田康哉提出要在王府内设立女学堂，按照日本的方式进行女子教育，并拜托内田为其介绍教师。内田托人找到了当时在北京警务学堂担任教习的川岛浪速，于是川岛浪速就介绍了河原操子。福岛安正与河原之父河原忠以及川岛浪速皆为信州（今长野县）松元人，且为旧知。1903年12月河原操子离开北京前往喀喇沁时，川岛和当时的日本驻清国公使内田康哉、青木宣纯大佐为其送行，一直送到东直门外。¹继毓正女学堂之后，贡桑诺尔布又设立了武备学堂，聘请日本陆军伊藤柳太郎少佐为教官，伊藤少佐并且带来了一到两名军官，三到四名士官。因为这种关系，内田康哉赞扬贡桑诺尔布为：“近年来蒙古王公中切实向本国求欢之第一人。”²而从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可以看到，自1905年起，贡桑诺尔布就曾经通过各种管道不断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秘密借款。³

为了支持贡桑诺尔布“举事”“勤王”，川岛浪速1911年12月通过福田安正参谋次长介绍横滨正金银行以“其全部领土为抵押”向贡桑诺尔布借款“两万两”。⁴1912年2月，为了建立“举兵的根据地”，在日本军方的支持下，川岛浪速和日本驻清国公使馆武官高山公通大佐又向准备逃离北京返回喀喇沁的贡桑诺尔布提供了三万发子弹。贡桑诺尔布还通过川岛向大仓组借款20万日元，并为此立下了字据：“代表卓索图盟五旗因保卫地方期间，借到大日本帝国川岛浪速君名下日金二十万元，言明年利五厘，三年为限，本利归还，以卓索图盟内所有矿山作为抵押，若不能归还时，任川岛君随意开采，期内不许他人开办，至支用方法亦必向川岛君商明，以昭信受，立借字为证”。⁵为了促成这笔借款，川岛关于“卓索图盟内所有矿山”的详情向福田安正作了以下说明：“卓索图盟内矿山极多，大约数十至五十几座，仅喀喇沁旗下就有10座金山、三座银山、一座铜山、七座煤矿。”

在组织“勤王军”的实际行动上，因为有自己的民族根据地，“蒙古人”好像是走到了“满洲人”的前面。川岛浪速给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电报中，可以看到“蒙古人”本身也的确希望自己能够领先于“满洲”而起事。⁶贡桑诺尔布以及巴林王在松井清助大尉和木村直人大尉的分别陪同下，于1912年3月5日离开了北京回到了喀喇沁和巴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贡桑诺尔布回到了喀喇沁后向其部下提出的目标却是“蒙古民族的独立”。⁷尽管日本抱着“将满蒙联合建设为一个王国”的“满蒙独立运动”之梦，但是中间认为贡桑诺尔布的行动说明，蒙古人的行动不过是为了蒙古民族的独立，而绝没有建设一个满蒙王国的意思。⁸

事实上，川岛浪速并非不知道蒙古王公的这些真实想法。因为他已经探知，在北京“不久前

¹ 波多野勝：《滿蒙獨立運動》（東京：PHP研究所，2001年），第76-77頁。

² 〈機密第五五号、喀喇沁王貸金ニ関スル件〉《対支借款関係雑件》/ 蒙古ノ部 喀喇沁王公対正金銀行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0740000, 対支借款関係雑件 / 蒙古ノ部(1-7-1-044)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³ 〈機密第五四号、漢公貸金ニ関スル件〉《対支借款関係雑件》/ 蒙古ノ部 喀喇沁漢公対正金銀行、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0739900, 対支借款関係雑件 / 蒙古ノ部(1-7-1-044)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⁴ 〈喀喇沁王横滨正金銀行へ借款申込ニ対シ在北京川島ヨリ意見具申併請訓〉《対支借款関係雑件》/ 蒙古ノ部 喀喇沁王公対正金銀行 / 3. 喀喇沁王公対正金銀行,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0740300, 対支借款関係雑件 / 蒙古ノ部(1-7-1-044)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⁵ 《対支借款関係雑件》/ 蒙古ノ部 喀喇沁王公対正金銀行 / 4. 喀喇沁巴林借款(対大倉組)、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0740400, 対支借款関係雑件 / 蒙古ノ部(1-7-1-044)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⁶ 〈附、參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六五號)一月三十一日, 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年)，146-147頁。

⁷ 中間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年)，第162頁。

⁸ 中間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年)，第143、151頁。



喀喇沁王和宾图王访问俄国代理公使，询问如果内蒙古独立时贵国可以提供何种程度的实际支持。”¹换言之，蒙古人对组织军队上的热情，可能并不是完全为了进行“勤王”，最大的可能是具有他们自己的“民族”的目的。他们对待日本的态度，其实也是应该在这个层次上被理解的。

3. 从“满洲”到“满蒙”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蒙古王公”藉以发动“勤王”之师的根据地都是邻接“满洲”的内蒙古东部地区。而这个地区，当时事实上也是被日本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地区。日俄战争之后日本虽然通过〈朴茨茅斯合约〉在“满洲”南部落下了脚跟，但对俄国却并不放心，为了确保到手的权益利权，就两国在“满洲”地区的势力范围与俄国进行交涉，两国于1907年签订第一次日俄协约，在协约案的《秘密协约》中决定将东经122度以东的东北地区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分别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而根据铃木仁丽《满洲国与内蒙古—从满蒙政策到统治兴安省》的说法，日本对内蒙古东部产生领土野心，则是随着日俄两国就满洲的势力范围进行的秘密谈判才逐渐明确起来的。

1907年的第一次日俄协约时，附件的秘密协约决定在东经122度以东的地区划分南北满洲，分别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在谈判中，日本并非没有意识到与“南满”相邻接的内蒙古东部的问题。当时日本企图以对俄国在外蒙古具有特殊权益的承认来换取俄国对日本在韩国具有特殊权益的承认，但是俄国却提出要将蒙古和满洲以外的中国边疆地区也划分为其势力范围，引起了日本的怀疑。当时的外务大臣林熏认为：“与外蒙古不同，内蒙古位于漠南，与俄国并不邻接而接近北京，若承认（内蒙古）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就会危及支那本土的安全，以至于打破东亚全局的势力均衡。这不仅是帝国所不能容忍的，也违背了日英协约第五条的精神。”²日英协约第五条即“保全清帝国的独立及领土”，由此可知，1907年的第一次日俄协约时日本虽然没有对内蒙古东部产生独占的野心，但是已经注意到了内蒙古在与俄国抗衡问题上的重要性。而到了1910年第二次协约进行谈判时，日本表现出了“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野心”。因为日本在南满的势力范围内建设铁路引起了俄国以及美国等的警惕，但俄国又因清朝政府借助英美资本建设锦州—齐齐哈尔铁路的计划被延长为锦州—瑷珲（中俄边境）线而对计划本身表示反对，并提出了建设张家口—库伦铁路的计划进行对抗，使日本政府发现如果锦州—瑷珲铁路计划落空，“会造成排除各国在满洲势力的结果而对我大为有利”，所以1910年3月2日作出决定支持俄国的计划。³北冈伸一认为：“以俄国的提议为契机，日本的经济的军事的利益关心得以更加向西部延长”，而铃木仁丽将此解读为日本因此“对东部内蒙古的关心发生变化，加深了野心。”⁴

辛亥革命以后外蒙古地区宣布独立，日本政府因为担心俄国因此将内外蒙古均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决定与俄国开始第三次密约，此时开始称内蒙古东部为“与我势力范围的南满洲具有最密切关系的地区”。⁵1912年7月8日签订的第三次日俄协约，将日俄各自的势力范围以东经122度为界改为以东经116.27度为界，俄国承认“内蒙古与中南满洲铁道有着深厚关系的部分均为日本的势力范围”。⁶“以1912年日俄之间缔结的第三次协约的附属密约为契机，日本在东部内

¹ 〈附、參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六五號）一月三十一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年），147頁。

² 此為林熏給伊藤博文韓國總監的第69號電報中的一段話，引自鈴木仁麗：《滿洲国と内モンゴル—滿蒙政策から興安省統治へ》（東京：明石書店，2012年），55頁。

³ 鈴木仁麗：《滿洲国と内モンゴル—滿蒙政策から興安省統治へ》（東京：明石書店，2012年），56頁。該書幾乎沒有提及「滿蒙獨立運動」，但依然對本文多有啟示，在此特致謝意。

⁴ 鈴木仁麗：《滿洲国と内モンゴル—滿蒙政策から興安省統治へ》（東京：明石書店，2012年），56-57頁。

⁵ 鈴木仁麗：《滿洲国と内モンゴル—滿蒙政策から興安省統治へ》（東京：明石書店，2012年），57頁。

⁶ 鈴木仁麗：《滿洲国と内モンゴル—滿蒙政策から興安省統治へ》（東京：明石書店，2012年），58頁。



蒙古的权益得到了承认。”¹1912年6月，日本还借参加六国银行团的谈判使各国列强同意在会议记录中加入了“日本国银行团，在得到本借款关联事项不给南满洲以及内蒙古东部的日本的特殊权益造成任何不利益的保证下，宣布加入本借款团”一文。²

铃木仁丽的研究主要针对日本政府和外务省的活动，而事实上军方和日本的民间势力在更早时已经对内蒙古东部地区表现出了兴趣。与喀喇沁同处于内蒙古东部的巴林旗，也是与日本较早发生关系的地区之一。辛亥革命爆发以前，巴林王就和日本的大陆浪人频繁接触。1908年2月，巴林王即以土地未担保向日本秘密借款（具体不详），而日本旅顺都督府陆军部（星野参谋长）极力赞同，理由是：“向该王施恩，打下今后利用的基础。”³大约是在1908年间，巴林王还招聘了一位名为片谷传造的日本大陆浪人为自己的顾问。1909年9月6日，片谷传造通过关东都督府参谋长星野金吾找到日本参谋总部第二部部长宇都宫太郎，“希望得到对在蒙古巴林与同酋王共同经营事业的赞同”，因为在他与巴林王各出资5万（巴林王以土地二百顷、牛400头、相当于5000元的木材相抵，之外为现金）的合作计划中，由他负责的5万元中仍有1万元没有着落，因而希望得到陆军参谋总部的支持。⁴片谷传造与巴林王之间有一个合作的一揽子计划：成立“德盛公司”，在巴林旗开办实业、包括开垦土地、造酒、采矿、畜牧、甚至发行纸币等。⁵

自1908年底至1914年之间一直担任参谋总部第二部部长的宇都宫太郎，1909年9月接触内蒙古事以后，一直鼓吹肢解中国，变“满蒙”为日本的领土，尤其是将内蒙古东部地区收入日本势力范围，“以备国家他日之用”。⁶这也正是片谷传造敢于来找宇都宫太郎寻找支持的原因。之后，宇都宫太郎先后找到递信（邮政通讯）大臣后藤新平、陆军大臣寺内正毅等人游说，虽然遭到当时驻清公使伊集院彦吉的阻拦，但是仍然从满铁总裁中村是公处得到了愿意出资的答复。⁷伊集院彦吉之所以反对这件事，只是因为他怀疑这份计划的可靠性及片谷人品，一旦出现差错这些都能够造成外交上的纠纷。果然，巴林王出于担心清朝政府的反对和对片谷的不信任，撤销了这份计划。这件事让宇都宫感到非常惋惜，1910年9月22日上午，宇都宫对第二天即将“入蒙”而前来告别的步兵大尉松井清助勉励道：“第一的目的为彻底研究蒙古语和蒙古文学，彻底研究蒙古以为日本合并蒙古之日所用。”⁸到了1911年1月，片谷再次寻求支持，原因是片谷又说服了巴林王，但是此次满铁只拿出了15000元投资畜牧事业。⁹

毫无疑问，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时期，喀喇沁、巴林、翁牛特等东部内蒙古地区的王公以牧业经营权和矿山开采权为抵押向日方借款，以进行“勤王”之事，也得到了日本军方的积极支持。宇都宫太郎明确表示，“在清国尤其是在满蒙激励获得更多的权益，此事已也向高山、守田、多贺等进行训示。作为矿山开采权的担保已经从外务省拿到八万元，从（参谋）本部拿出三万元、

¹ 鈴木仁麗：《満洲国と内モンゴル—満蒙政策から興安省統治へ》（東京：明石書店，2012年），52頁。

² 鈴木仁麗：《満洲国と内モンゴル—満蒙政策から興安省統治へ》（東京：明石書店，2012年），65頁。

³ 〈星野參謀長から外務次官宛の電報〉，明治四一年二月一日，《対支借款關係雜件》/蒙古ノ部 喀喇沁王公対正金銀行 / 2. 巴林王借款申出、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0740200, 対支借款關係雜件 / 蒙古ノ部(1-7-1-04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⁴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1—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09年9月6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26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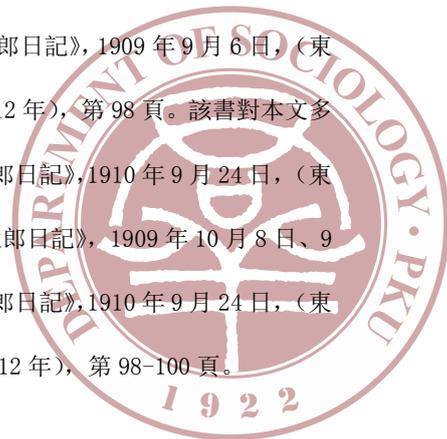
⁵ 北野剛：《明治・大正期の日本の満蒙政策史研究》（東京：芙蓉書房出版，2012年），第98頁。該書對本文多有啟示，在此特致謝意。

⁶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1—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0年9月24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374-375頁。

⁷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1—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09年10月8日、9日、11日、14日、18日、22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276-280頁。

⁸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1—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0年9月24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374-375頁。

⁹ 北野剛：《明治・大正期の日本の満蒙政策史研究》（東京：芙蓉書房出版，2012年），第98-100頁。



共计十一万元经多贺之手交给喀喇沁、巴林等地。”¹满铁、外务省、三菱财阀的岩崎久弥，甚至是本愿寺，只要是能够借到钱的地方，都能见到宇都宫太郎前往游说的身影。²

川岛浪速也就“勤王”之事向日本驻清国公使伊集院彦吉报告经过及对于日本国家之意义，以便得到外务省的支持：“蒙古举兵之事正在着实进行之中，喀喇沁王已经决定数日之内离开北京。”“这是掌握在蒙古各种权利的机会”，积极促成日方向多名蒙古王公借款，如向巴林王借款一万两（以其管辖内的矿山开采权为抵押），“与巴林敖汉等昭乌达盟十一旗之间签订特殊密约之事已经接近成功”，“宾图王已申请借款，协议一两日中即可成立”，“这些借款大部份的用途为举兵之用”。³

但是很明显，东部蒙古地区的蒙古王公们的行动，并没有一定要建立“满蒙”国家的目的。与其说是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蒙古王公，还不如说是川岛浪速对建立一个“满蒙”国家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即使在蒙古扶植我方势力，满洲方面也定会议论纷纷。如果建立了民主国，（满蒙之间——引用者）围绕权利问题的冲突必然越来越频繁，我国的对支那外交将比从前更加棘手，为此两国国民之间感情越来越对抗。列强必然趁虚而入实施离间之计，收渔翁之利。况且蒙古与我国之间永远有一道无法消除之墙壁（指因为相隔东北地区而没有直接接邻——笔者），因此不仅蒙古之经营总是要受到阻碍，恐怕蒙古自身也会因侧面受到威胁而最终以至于无存。故蒙古与满洲提携方得生存，满洲得到蒙古方得生存。因此，满洲举兵即使有一定困难，但也要排除障碍坚决实施之。”⁴这一点与川岛的政治态度有关，他一直积极主张帮助恢复清王朝的统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用剽悍勇武的蒙古人。他在1911年12月13日发给福田安正的电报中说道：“东部蒙古王公越来越团结，而满洲人大多缺乏气魄，不值得依赖，且有类似乌珍那样已为袁世凯所收买的。”⁵

内蒙古东部王公的“勤王”最终也没有付诸行动。其最直接的原因，还是日本政府的政策出现了变化。清皇室退位、袁世凯接替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俄英两国极力主张在袁世凯的领导之下统一中国，也包括东北地区、即“满洲”在内。碍于这种国际局势，日本政府2月20日做出了最终决定：只要是没有妨碍到日本的“在满特殊权益”，就对中国内政保持“严正中立”。因此，教唆蒙古王公“举事”的行动被叫停，对各个蒙古王公的借款总额也被限制在15万以内。川岛也因此被参谋本部次长电召回到日本国内，⁶并被严令禁止继续参与“蒙古举事”。⁷为了褒奖川岛浪速在义和团事件时与多贺宗之少佐积极配合军部的表现，以及对他个人当时所破费的私财的补偿，5月4日，宇都宫太郎还以“清国学生管理委员长福岛安正”的名义，从该委员会资金中拿出了5000日元“赠与”了他。⁸

¹ 宇都宫太郎関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2—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年4月11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100頁，

² 宇都宮太郎関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2—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年4月11日，5月7日-5月10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100頁，108-110頁。

³ 《对支借款関係雜件》/蒙古ノ部 喀喇沁王公对正金銀行 / 4. 喀喇沁巴林借款（対大倉組）、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0740400，对支借款関係雜件 / 蒙古ノ部（1-7-1-04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附、參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六四號）一月三十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年），146頁。

⁴ 〈附、參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六五號）一月三十一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年），147頁。

⁵ 〈在北京川島から次長宛の電報〉受七九二、6 明治44年12月12日から明治44年12月14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50624400，清国革命動乱ニ関スル情報 / 陸軍ノ部 第三卷（B-1-6-1-39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⁶ 宇都宮太郎関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2—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年2月26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88頁。

⁷ 中間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年），第143、150頁。

⁸ 宇都宮太郎関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2—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年5月4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107頁。



为了支持蒙古举兵，日本军方曾于1912年2月1日决定向开元（开原）运送枪支500挺，子弹20万发。¹除了前一年中已经派遣前往满蒙地区的多贺宗之少佐外，高山公通、守田利远大佐、松井清助大尉等也在此时陆续来到了东蒙地区。在得到了“严正中立”的命令后，参谋次长福田安正通知当地的日本军官等候时机，借此时机“精练军队，秘密储备大量兵器弹药，令各王公相互联合，以便他日协同行动”。²福岛正安于4月26日被任命为关东州都督（即当时日本在辽东半岛占领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³5月22日宇都宫太郎在新桥车站为福岛送别，福岛告诉宇都宫，西园寺公望首相面命福岛一并处理“蒙古的事情”。而宇都宫太郎在听到此话后想到的却是：“勿论满洲应该完全由都督来处理，但蒙古则应该交予参谋本部直接经营可能会更好一些。”⁴

川岛浪速为了给在喀喇沁旗的所谓“勤王军”运送军火补给，在日军多贺宗之少佐、松井清助大尉等人的帮助下将一大批军火从旅顺通过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运送到了公主岭，之后装上马车准备穿过吉林、辽宁、内蒙古交界处的郑家屯运送至喀喇沁。此次行动有多名日本人参与，由外号“薄天鬼”的在东北的日本马贼薄益三及其侄子“薄白龙”领导，另有中国马贼左宪章（薄益三的拜把兄弟）带领大批马贼进行护送。但奉天将军赵尔巽侦悉了川岛浪速的计划，严命驻郑家屯统领吴俊升进行拦截。6月8日，运送队伍在奉天近郊的郑家屯附近与中国军队发生枪战，13名日本浪人和30多名中国马贼被击毙，随行的松井清助大尉也受了重伤，薄益三等23名日本人被捕，43辆马车上的武器都被悉数烧毁。⁵“蒙古举兵”、“勤王”乃至所谓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有趣的是，在清帝退位以后，许多蒙古王公纷纷投向了袁世凯，如曾经由清廷派往日本留学（在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在决定清王朝前途生死的御前会议上，慷慨激昂地反对过清帝退位的帕勒塔，很快就投入了袁世凯的阵营。也有部分人确实开始了“独立”的活动，而这一活动又让他们与川岛浪速走到了一起，贡桑诺尔布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通过川岛向日本借款和购买军火，潜回本旗图谋起事，但是因为武器被截梦想成为泡影，最后才不得不回到了袁世凯的身边。⁶这些再次说明，蒙古人与“满蒙独立运动”，不过是一个相互利用的关系，他们真正想要得到的，不过是民族的独立，而川岛等人的主动接近，不过是给了他们一条接受日本援助、从而便于走向独立的道路而已。然而，川岛本人的想法显然不是为了蒙古的独立，而是为了维持清王朝及其余党的统治。这一想法虽然与宇都宫太郎的观点相同，但是却遭到了以外务省为代表的日本政府的反对（虽然一时也有这种想法）。川岛就是要利用勇敢剽悍的蒙古人来实现这一目的。

事实证明，虽然被冠以“满蒙”之名，然而所谓“满蒙独立运动”不过是在以日本军部支持为背景的川岛浪速的设计、策划和利诱下才能够成型，其策划人、发起人、精神领袖、运动核心甚至运动主体都既不是“满”，更不是“蒙”。川岛浪速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表面上看来尽是清人

¹ 宇都宫太郎関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2—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年2月1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81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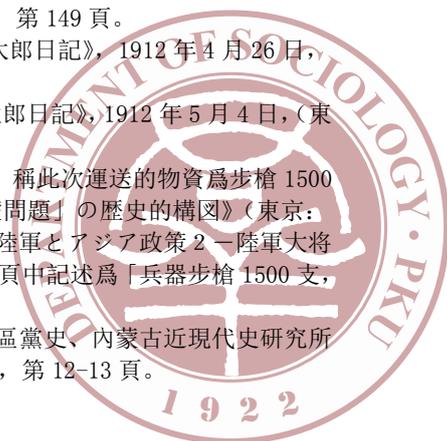
² 中間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年），第149頁。

³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2—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年4月26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105頁。

⁴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2—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年5月4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113-114頁。

⁵ 根據中間立夫獨自發現的資料，薄益三在被中國地方治安當局逮捕後的供詞中，稱此次運送的物資為步槍1500支、子彈30萬發、短槍200只和25000元、銀500兩等，中間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年），第156頁。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2—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年8月10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137-138頁中記述為「兵器步槍1500支，子彈30萬發等」。

⁶ 汪炳明：《清朝覆亡之際駐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動》，內蒙古大學中國內蒙古地區黨史、內蒙古近現代史研究所編：《內蒙古近代史論叢》第三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13頁。



自由行动，我国只是在暗中给予支持而已。”¹尽管其目的与其他许多大陆浪人的在华活动一样为扩张日本在华势力范围，然而由川岛浪速设计的“满蒙独立运动”不是通过利用新的反政府势力去开辟新天地，而是借维持和恢复传统王朝的名义利用旧势力直接控制一直为日本垂涎的满蒙地区，真可谓是独辟蹊径。由于这一特点，川岛浪速的许多想法与做法也是独出心裁。例如，袁世凯之所以要遭到反对是因为他导致了清王朝的寿终正寝而不是因为他抵制了革命党，以反对皇室退位为目的而成立的宗社党能够被转化成了“独立运动”的象征，边疆地区的“民族”的要求在软硬兼施的利诱之下很快就冠上了“勤王”的美名。

中间立夫认为，所谓的“满蒙独立运动”作为一个实体并不存在，它只不过是川岛浪速所追求的一个幻影。²因为所谓“独立运动”，究竟指的是“满洲”或“蒙古”地区的独立，还是“满”族或“蒙”族的民族的独立都说不清，而“复兴清朝”与“满蒙独立”二者的政治方向根本不同。³究竟是“打造满蒙为一个统一的新国家”呢，还是割据过去的清王朝领土的一部分拥立肃亲王建设一个新国家呢，而且这个满蒙新国家的领域范围究竟在哪里？所谓“运动”根本就没有一个明显的目标。⁴他的看法的确有着一定的道理，要让“满蒙”这样两个本来就为不同的民族集团构成一个“独立运动”的主体，天生就具有了一种矛盾性和对抗性因素在内。

4. 川岛等人政策提案报告中的“满蒙独立”话语

肃亲王善耆来到了旅顺之后曾经吟诗一首：“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⁵这些对往日权贵生活的留恋，能够令人感受到他何以要去追求“满蒙独立”。然而，一直与肃亲王保持联系的川岛浪速以及其他支持“满蒙独立”的日本人又是出于什么用意呢？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保存着当时这些人向日本政府提交的政策提案报告，从中可以看出，在所谓“满蒙独立”的问题上，他们其实有着肃亲王不可能想到的目的。被召回日本的川岛浪速耐不住寂寞，于1912年（大正1年）8月向日本外务省提交了两份政策提案报告，其一为8月25日提交的《对支那管见》，另一为8月28日提交的《对于和平对支外交之私见》。其中，毛笔书写长达46页的《对支那管见》⁶（以下简称《管见》）全面阐述了他对中日关系的见解。从他对于北部边疆的“满蒙”、特别是“蒙古”与中国近代国家之间关系的解读来看，其中所展现出的川岛浪速关于“满蒙独立运动”的思路至今仍然值得注意。

1. 中国未来的局势必将是一场大分裂，这是由于中国、汉民族的“一团散沙”的国民性所决定的。由于这种国民性，汉民族不可能具备作为近代“国民”的素质：“吾人之口癖，常以沙子比喻汉民族，是因为性格如沙子。任何一粒都个个坚固如石，自我守卫力量坚固不易粉碎。此正如支那人的利己观念极端发达，其保卫自我利益的能力是我邦人远不能及。然而由于沙子个体过于坚固因而其粘合力完全消失，无法将其多数合而为一个团结体。此正是支那人即使具有成为一个人种的能力，也缺少成为国民资格的原因。”（《管见》第10-11页）

虽说中国发生了“革命”，但是辛亥革命不但没有改变这种一团散沙的国民性，反而使这种国民性得到了释放的机会：“世人常视今回革命之乱为汉民族觉醒奋起，以为将来出现一新

¹ 〈附、參謀本部宛川島發電文〉（第六五號）一月三十一日、會田勉：《川島浪速翁》（東京：文粹閣，1936年），147頁。

² 中間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年），第253頁。

³ 中間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年），第106頁。

⁴ 中間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年），第124頁。

⁵ 〈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上），葛生能久：《東亞先覺志士記伝》中（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5年），第302頁。

⁶ 川島浪速：〈對支那管見〉（〈對支管見〉，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30267800，《支那政見雜纂》，第一卷（B-1-1-2-15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国家之希望，其实是一大谬误。爱新觉罗氏用来囊括之皮囊三百年间已经腐蚀朽废，……至于去秋彻底破裂，囊中沙粒尽然散乱于地，以致再无收拾之器。此为今次革命乱之真相，决非意味着囊中沙子开始活动自己冲破皮囊。试想义和团以前支那人之状态，屈服专制政治，发一言书一字尚且战战兢兢，决非敢触犯一点忌讳，故十年以内此国民性绝不可能在短短日月中出现根本变化。”（《管见》第12-13页）

2.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只有走向更加分裂，而帝国主义列强必将借此机会在中国分割争抢自己的势力范围。“只见全社会充满不义诈术、无耻诡计、欺瞒排挤、苟合反复、横夺虐杀等各种罪恶，分明不过是乱沙散漫一片，何处可见共和之真意？如洒水于沙虽一时可以凝为一团，……水即利益之水，然一朝水干即立刻分手，此亦沙之本性也。彼袁世凯为支那人中性情和才智最为发达者，亦不过为此种散乱沙粒中最大的一颗而已。满腔个人野心，毫无诚意可言，只有一时权术，而无立百年之国经纶。……然沙子最终无法集合团结沙子，……如最富于支那式伎俩的袁世凯尚且无望，即使孙黄（即孙中山与黄兴——笔者）又怎能完成统一之业。吾人敢于断言，以此汉人种之性格，即使出现一二豪杰，也难以找到统合全体之方。因此，只要没有一种新的力量对其国民性加以根本改良，支那终究无望组织一个健全的国家，为最早难逃亡国命运之属。这是帝国制定对支那政策的最重要的出发点。”（《管见》第15-16页）“据吾人所知之现状，中华民国分裂土崩之势或者不出数旬。……最终各国肆无忌惮地以武力制定压服自己有利的势力范围。”（《管见》第17页）

3. 日本固然有独自征服中国之能力，但为国际局势所不容，因此中国最后只有被列强分割。但如果列强分割了中国，则必然会对日本也造成威胁。“元清诸族尚且完成征服之功，况我帝国具大元清数倍之力，征服汉族决非难事。然眼下国际形势不会容忍帝国单独占领，如此一来只有列强分割一条道路。”（《管见》第18页）“勿论分割时机到来时帝国也会占有其中一份，然并不可以此为庆喜悦，因其恐引来远方的欧美列强与我擦肩比踵邻近接触，致使我国外交愈加困难，不堪烦累。即使帝国势力发展，也有直接给予他国压力、肇白种联合之端，乘我国实力未有充实之机实施压迫，陷帝国于无法再起之境地。”（《管见》第2页）

4. 为了应对这种列强分割中国、进而对日本造成威胁的局面，日本应该加强在中国的实力，找到巩固的落脚点，而最好的目标就是满蒙地区。“要之，在支那领土上加强我国实力，将来无论出现何种事态，我们也可以对列强一直优胜的地位，发挥东方主人公的实力。”（《管见》第3页）“为了实现以上理想，首先就要从满蒙出发建设和巩固我们的立脚点。”（《管见》第3页）“不论中华民国是否成立，为了帝国的生存发展，作为建立解决支那问题的立脚地，都应该趁此良机将满蒙完全收入我实力范围之内。”（《管见》第5页）

“我一直反对帝国采取俄罗斯式的单纯无意义的侵略政策，但认为必须得到满洲之一部及蒙古东部，今次列举其理由。一，出于针对俄国势力保卫我国的需要，……；一，将来不论支那或其他亚洲方面何等强国勃兴，帝国至少在满蒙方面具有坚强的立脚点就可以掌握亚洲霸权，持此牛耳可一直制约操纵诸国，……；一，适当安排以异常速度不断繁殖增加之人口，为救国民脱离将来之生存竞争的大苦境而准备人口稀少的领土；一，通过殖民加深与母国之关系，制造终古不可分离的集团形势，……；一，占有天然富矿未开的地区，……；一，为最终解决横在眼前的支那问题而在大陆占据最为有利的立脚点。”（《管见》第1-2页）“无论将来在支那及其他亚细亚方面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强国，帝国只要在满蒙方面具有巩固的立脚地，就可以永远握有亚细亚的霸权。”（《管见》第1页）

5. 然而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日本也不能实行对“满蒙”的直接占领。一为，“最值得担忧的是，一旦帝国为始作俑者，必然出现列国仿效的结果。”（《管见》第6页）另一为，如果日本直接占领满蒙，就会变成满蒙与日本相对抗的局面，那么日本至少需要三至四个师团才能够镇压。即使镇压成功，驻守广袤的内蒙古的守备部队就需要两个师团。但当地人因此心中越来越仇恨日

本，与日本永远对抗，反而使日本永远得不到满蒙。（《管见》第7-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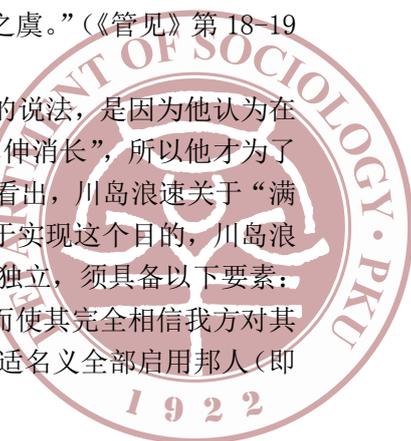
6. 通过以下步骤最后实现占领满蒙的目的，“不如暗助利导当今满蒙人脑中和发现中的独立实行，只待时机成熟后，表面上是他们自己希望从支那分离出来自成团体，日俄协力首先共同对其暗助密援建成一个事实上的保护国，使此满蒙团体不得不与支那本土进行对抗竞争，因而势必成为愈加依赖我方的一种势力。而我方则在一段时间内利用该势力，根据两国之间提前协商的势力范围，逐渐掌握政权收取权益，不出数年帝国即可在南满洲及内蒙古方面形成坚定的巩固的实力。此即省力节费避名取实之法也。”（《管见》第6页）

第一步通过诱导和支持满蒙在实质上的独立使其成为日本的保护国，第二步是日本逐渐掌握这个保护国的实际权力，在此之上才是第三步、即寻找直接占领的机会：“如他日遇到公然割取冠以我国领土名义的机会，只要立刻再来一次类似合并朝鲜时的手续即可矣。当然，这比起朝鲜来说要更加容易。所以，只要首先帮助他们成功，在恩威并施之上适当怀柔控制操纵，让他们满蒙人个个感觉生活幸福增长，其来归化自如水流入卑。此为五千年来彼等传承而来之国民性，为历史所屡屡证明。欲取其国者先取其民心，千古不易之原则也。”（《管见》第6-7页）

7. 这个国家必须是“满蒙”一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一支无敌于中国的军队：“如能如上所述巧妙利导满蒙人使其实现独立成为一个国家的希望，促成感情融和相互信赖之状态，我们的理想就不难实现。使其一切政务大都凭借邦人（即日本人，下同——笔者）之智识方能运转和组织，可使其将更多的力量投入军备，让独立军之精锐兵力在邦人的指挥训练下成为全支那都无法比拟的强兵。”“蒙古人无疑具有惊人的体力和勇气，说按照蒙古式的实践和训练的兵卒材料冠绝世界也不为过（但日本人除外）。虽说当年作为成吉思汗的部下扫荡横行世界的资质并没有全部湮灭，不过这三百年中中了清祖的巧妙政略之毒，一直安于晏然愚昧而已。如今彼等蒙古人正从长夜睡梦中醒来，但是尚无指导统合的有智识之人。如果以邦人的智识、德性、勇气，由邦人隐然起到首脑作用，建成一支坚强团结的军队，必能够发挥出惊人的强大作用。”（《管见》第8-9页）也就是说，在川岛浪速关于“满蒙独立”的思想中和如何付诸实施的思路，蒙古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可以被利用的武装力量。

8. 利用练就出的这只军队，借汉民族对北方民族的恐惧感，以便最终达到以满蒙控制中国的目的。“对汉人种来说，古来认为北方强悍之传言至今犹为事实。居住于满洲的汉人之勇悍刚强气势且远胜于支那本土，如使满蒙人坚强联合团结，勿论其武力将无敌于四百余州。”（《管见》第8-9页）“我最终拿出的方案，即上述通过满蒙独立建立立脚点之策。建设一个有名无实的保护国，掌握其实权，培养其兵力，到了中原溃乱不得不收拾之际，立即暗中指挥彼等满蒙团体以猛烈的武力（勿论当以日本人为其中首脑）突入中原，以令人恐怖之威力攻击之，以恶鬼罗刹之势踏破之，就如在沙中滚滚滚烫的大铁球，使其四百余州无人敢于抵御。以彼等汉民族性格，即刻战栗恐怖、小儿止啼、望风而降，与当年元清侵入时毫无二致。而帝国只要能够始终掌握满蒙团的命门，能够控制并教其建立巧妙对内对外政策，即使不能统一全国也可以轻易统一半部，如此他们的国权及地域所至即为帝国的势力所至。在支那国土上无论出现如何事态变化，无论其统一是否长久，我方只要在此期间建立排除不了之实力，就绝无落人之后之虞。”（《管见》第18-19页）

川岛浪速之所有会有以上关于“满蒙独立”的思想和思路，按照他的说法，是因为他认为在“满蒙”地区“打下安定坚固的发展基础”，“关系到帝国百年国运的屈伸消长”，所以他才为了实现“满蒙独立”而“苦心积虑”。（《管见》第17页）从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川岛浪速关于“满蒙独立”的思想和行动，都是在为了实现日本的利益。如果不能够有助于实现这个目的，川岛浪速是不会支持“满蒙独立”的：“如果按照我的设想决定首先促成满蒙独立，须具备以下要素：一，首先在帝国与满蒙团之间进行意思疏通，为了建立强固的结合关系而使其完全相信我方对其之保护；一，使满蒙团的内政外交完全听从帝国的指教，文武要职通过合适名义全部启用邦人（即



日本人)，由邦人掌握实际的枢纽；一，为达到以上目的，成为满蒙团主脑的人物，必须由我方选择我方信任并认为可以成为傀儡而自由操纵的人物。”（《管见》第 19-20 页）

1912 年 8 月 25 日的《对支那管见》说明，川岛浪速进行“满蒙独立运动”的最终目标，至少在此时已经不再是为了恢复清朝，而提出“满蒙”的概念也不过是为了进行操纵而已，而操纵“满蒙”的目的，已经是为了保证日本在整个中国的利益。正如波多野胜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川岛浪速来说孙文的革命不值一提，他的关心不在中国南方而在满洲及中国北方。虽然的确具有同情清朝的成份，但是在他的视野里，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客体，只不过是为了强化日本的存在根基的一个政策而已。”¹

川岛浪速于 1912 年 8 月 28 日向外务省提交的第二个意见书《对于和平对支外交之私见》²（以下简称《私见》）只有短短四页，从内容上可以看出，这是在他提交《管见》之后又紧急写就的。其背景一是日本与俄国于 7 月 8 日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协约》，二是国际社会开始讨论对中华民国进行承认的问题。如前所述，日俄第三次《日俄协约》的《秘密协议》的内容主要就是重新划分两国在内蒙古地区的势力范围。³ 最近由于逐渐受到俄国行动之刺激，在满蒙问题上全国普遍产生不安，有关满蒙处理方法事实上已有成为国民普遍关心之一大问题的倾向。”（《私见》第 1 页）因为 2 月时川岛浪速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之所以被叫停，原因就是俄英两国主张在袁世凯的领导之下统一中国，保全中国领土完整。所以可以想象，当川岛浪速知道了日俄两国之间关于内蒙古势力范围的秘密外交活动之后，当然不会袖手旁观。

《私见》开门见山即提出：“如果帝国想要实现帝国在满蒙长久以来的理想，通过和平外交方式从民国得到在满蒙的权益，那么就不能不首先提出充分具有价值的要求进行谈判尝试，其要义与主要着眼点必须是争取与俄国在满蒙之所得利益保持均衡。出于生存和自卫之目的，帝国可以堂堂正正地就自己所应该得到的东西提出要求。估计世界各国原本明白，甚至心中已然理解。尤其是英俄，对照其自身在蒙藏之行为，本来就已没有对我行为容喙之权利。帝国也必须让民国看到这一点，让其明白只有承认了这一点，两国之间才具备提携的可能，因此知道答应给予俄国的权益，必须与给予帝国的权益相等。必须看到，如不采取这种态度而只顾迎合民国之感情，即如他人所说：为一时之策而满足于得半文一钱的乞丐外交，会为将来留下后患，成为一大失策。”（《私见》第 1 页）

“可以预料，如现内阁依然实行姑息的对支外交，即使有些零碎所得，国民也决不会满足和对之进行讴歌，反而可能以此为攻击政府的材料，大呼政府外交无能。”（《私见》，第 1-2 页）“俄国在蒙古方面的行动到何种程度可以为我国对支外交的重要指标。我们必须按照这种程度，不得更改。我认为俄国必然只有推进而决无后退之理，即使一时停滞也必然会再有第二、第三步，得寸进尺已是必然之势，无疑是企图在占有了全蒙古之后再染指中原。更何况支那自灭自亡已是必然之势，不久的将来万里长城将会践踏在俄军骑兵铁蹄之下。”“支那的最后结局，不过是一个是由俄国而为还是由帝国而为的问题，只是迟速问题。此亦帝国的存亡兴废之判决，岂可局促于目前而忘长计。”（《私见》第 2 页）

川岛浪速建议利用新生的中华民国希望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机会，在满蒙问题上同民国政府进行讨价还价：“依我预料，目前俄国在（外——笔者）蒙古的活动一定能够成功，不论以何种名义或何种一时之计，其实质无疑都是要由俄国掌握实权和独占权益。更何况西藏业已落入英国之手，民国要想完全恢复全部领土已经无望。因此，如果承认民国，如何认定其领域将会是一个

¹ 波多野胜：《滿蒙獨立運動》（東京：PHP 研究所，2001 年），第 78 頁。

² 川島浪速：〈平和的对支外交ニ対スル私見〉，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30268200、《支那政見雜纂》，第一卷(B-1-1-2-15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³ 關於第三次〈日俄密約〉的詳盡內容，參見蔡鳳林：《日俄四次密約——近代日本滿蒙政策研究之一》（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80-130 頁。



大问题。例如，如果俄国在全蒙古的意义上承认民国主权，那么帝国是否应该对此默认？或者俄国欲使蒙古之一部脱离民国范围，那么帝国是否应该默认其分界线？俄国若号称与帝国尊重协议范围而自定分界，因其事实上掌握实际权力，而我最终也不过是徒拥虚名而已。但如果帝国将此独立出去的蒙古地区也无条件地认定为民国的领域，无异于自认东部蒙古将永远不会为我所有，就会自绳自缚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若他日再想从民国割取该地域，就等于自求对全世界背信之名。考虑到这些，就可知对于帝国而言，是否承认民国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关系重大、并非一个以些微利益就可以成为交换条件而轻易答应的问题。我认为我国政府必须在此问题上进行深思顾虑。”（《私见》第2-3页）

川岛浪速并且直接为日本政府设计了从中国割让满蒙地区的具体方案：“出于以上考虑，我认为，作为承认民国的交换条件，帝国政府应该获得在满蒙的权利。姑息是绝对得不到敬服的手段。虽说不如以某种方法使满蒙与民国自动分离更好，但我国政府必须制定出方针。而在未承认以前，帝国可以提出关于满蒙的条件之要领大体如下：一，民国若要承认俄国关于蒙古独立的要求时，不能将东部蒙古（以图明示）划入其范围内；二，永远不许将东部蒙古割让于他国；三，俄国臣民在蒙古得到的商业工业上的特权，帝国之臣民也必须在东部蒙古得到与此相同待遇；四，若俄国在蒙古铺设铁道，就必须在东部蒙古为帝国保留此项权利；五，不许将南满洲及东部蒙古的土地矿山森林铁道及其收入让与他国之人，或者以其为借款之理由；六，不许将南满洲及东部蒙古的铁道铺设权利给予他国；七，给予帝国建设吉会铁道及奉海铁道等我国之急需各铁道的权利；八，给予帝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蒙古全境居住、营业的自由和土地所有权；九，延长所有各项帝国在南满洲既得权的期限。”（《私见》第4页）

那么这些川岛浪速提出的日本关于“满蒙”的要求，与他所鼓吹的“满蒙独立”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无法肯定民国政府是否接受以上条件。如果不肯接受，就可认以此认定民国无视帝国在东亚生存和自卫上的权利，宣布民国缺乏与帝国一致协力维持东方大局的诚意，暗中反对承认民国，同时在满蒙问题上作出允许其自由活动的姿势。在今天的状况下，他们最终会不得不屈服，何况民国已经不得不放弃外蒙，在西藏问题上也要答应英国的要求。”（《私见》第4页）也就是说，川岛浪速希望日本政府学习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做法，将鼓动“满蒙独立”当做一个不时要挟中华民国政府接受日本要求的工具。

当然，将“满蒙”纳入日本势力范围的想法绝对不是川岛浪速的创作，而将内蒙古东部也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一事，不仅得到了日本军部的支持，也是许多具有“国权主义”思想的日本政治家和大陆浪人的共同愿望。1911年10月，井手三郎（众议院议员）、岩田凡平、小越平陆（大陆浪人）、田锅安之助（东亚同文会常任干事）、根岸信（《东京朝日新闻》政治部记者）、中西正树（大陆浪人）、中野二郎（大陆浪人）、中村弼（《二六新报》主笔）、山内岩（大陆浪人）、松平康国（汉学家，曾为张之洞顾问）、荒贺直顺（大陆浪人）、宫岛大八（书法家，川岛浪速好友）等人¹向外务省提出了一份《对支那时局卑见》（以下简称《卑见》），²内容主要也是关于“满蒙问题”：“鉴于俄国在外蒙古活动，日本应借机将内蒙古收入我势力范围之内。”

《卑见》主张将日本的势力范围由“南满州”扩大到内蒙古的理由有三点：“将此地收入我方势力范围，以此作为对抗俄国的立脚点。此为需作如此处理之第一理由”；“如果想让支那政府常常与我方采取共同行动，就有必要使其一直感到我们的震慑力。如果我们收入内蒙古并在此铺设一条可以从奉天到达张家口附近的横断铁路，我方就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向北京背面运送大量兵力，北京政府自然会因此一直感受到我方压力，恰如俄国想铺设恰（恰克图——笔者）张（张家

¹ 以上人物簡曆一部分參考大裏浩秋：〈漢口樂善堂の歴史〉（上），神奈川大學人文學會《人文研究》第155期，2005年，第59-87頁。

² 〈对支那时局卑见〉附圖略解，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30268100《支那政見雜纂》，第一卷(B-1-1-2-15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口——笔者）铁道却由我取而代之。北京政府因感知我方有此准备方才能听从于我，如果不做这种准备而漫谈保全（中国领土——笔者），日后难保其不会成为英美走狗而反咬我方。此为需作如此处理之第二理由。”

作为“需作如此处理之第三理由”，《罕见》则是分析了汉民族的国民性：“正如某人对支那民族所疑：极端自私的人民今后如何能够在与列强的竞争中立足和维持国家独立？作为政治的国民极端缺乏公义心，作为军人极端怯弱。如以此等人民组织国家，其结合力自然极端薄弱，稍有动作即会自行崩溃，遑论面对外敌抵抗能力微弱。如果今后祸乱续发，支那自动解体，受到最深刻影响的无须置疑即是我们日本。”“如俄如法如英，都是通过其属国边境与支那相接、而本国在数千海哩之外，不会受到发生在支那政治变革的影响。只有日本，支那的存亡兴废马上与本国的国势力消长相关，严重时甚至威胁到（国家的——笔者）独立。”“况且今后我国今后主要发展方向，为通过领土近接、能够缓急相救的支那向外发展。但是（支那——笔者）万一发生问题，就等于出路遭到堵塞。”“尤其是今后支那因局势的变化而发生自行崩溃或被分割等与日本兴废发生紧密关系的问题时，日本就不应该将支那交给横行的乱民和互相争夺的白人，而应该主动出兵解救遭到涂炭的国民，从而履行作为友邦国家的最高义务。虽然支那现状如此，尚不知何时发生问题，但是应该从现在起就制造立脚点。”

虽然川岛浪速所提出的《对支那管见》在《对支那时局罕见》之后，但从关于汉民族国民性的议论上来看，《罕见》可能是受到了川岛浪速思想的影响，或者是二者之间互相影响。无论是从对抗俄国上，还是从牵制中国的问题上，还是因国民性而导致分裂后对日本影响的分析上，《罕见》的思想都与川岛的想法十分接近。但是与这些人的空泛议论不同，川岛浪速明确提出了一条实现“满蒙独立”的路线图，并且采取了具体的行动。川岛浪速的思想和行动，对日本主张向大陆发展伸张国力、因而一直对俄国抱有高度警惕的所谓国权主义者起了很大的影响。因为辛亥革命发生、尤其是就任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之后，孙中山在“满蒙”问题上开始变得暧昧，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从1913年春开始逐渐改变他的对中国方针，¹开始与在1889年时即已开始策划“满蒙独立”、²因而被称为“满洲建国先驱者”³的川岛浪速迅速接近，转向赞成从中国分裂满蒙地区为日本保护国的活动，⁴这应该就是内田良平在《对支私案》、《对支问题解决鄙见》等中提出分割中国方针的背景。前文已经提及，内田良平在其1914年10月提交给日本政府有关部门的《对支问题解决鄙见》中，公然提出要让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及内蒙古的优越地位，将统治权委托给日本”，而其中的中日两国《国防协约私案》实即日后“21条”的蓝本。

1913年7月27日，川岛浪速与内田良平等人一起，联合主张对外实施强硬政策（对外硬）的12个政治结社一起组成了“对支联合会”，对当时尚不愿过多介入中国内政的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其中当然少不了“满蒙问题”。1913年（大正二年）8月1日，大竹贯一（国会议员）、冈部伊三郎、中西正树、中井喜太郎（《读卖新闻》总编）、中岛气峰、望月龙太郎和五百木良三（著名国粹主义者）等人共同向外务大臣男爵牧野伸显提出了《对支那意见书》，⁵其实也主要是强调“满蒙”对于日本的重要意义和在“满蒙问题”上日本政府应该采取的方针：“一，南满洲曾是

¹ 初瀬龍平：《伝統的右翼内田良平の研究》（北九州大学法政叢書1），（福岡：九州大学出版会，1980年），第172頁。

² 〈川島浪速の支那渡航と最初の滿蒙建国計画〉，葛生能久：《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中（東京：黑龍会出版部，1935年），242頁。

³ 〈滿洲建国の先驅者川島浪速〉，葛生能久：《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中（東京：黑龍会出版部，1935年），212頁。

⁴ 初瀬龍平：《伝統的右翼内田良平の研究》（北九州大学法政叢書1）（福岡：九州大学出版会，1980年），第173頁。

⁵ 〈對支那意見書〉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30268400，《支那政見雜纂》，第一卷(B-1-1-2-15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日本丧失 20 万国民和消耗 18 亿国财之地，而今日俄之间协商（指第三次〈日俄密约〉一作者）又同意将南满与内蒙古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因此日本应该将如何处理南满和内蒙古问题作为合并韩国之后制定大陆政策的原则（实即出发点，下同——笔者）。一，如果确立了这一原则，之后就是捕捉时机，而此绝好时机非今日莫属。只要中国南北交战，就不会受到南北双方的共同反击，同时会减轻抵制日货运动的压力，因此容易坚持这一原则。一，随着支那战局的发展，不论将来满蒙形势如何发展，只要保持现状，不论是进入中华民国治下还是归谁，日本都应该借此机会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满蒙的势力，至少要不失时机地获得居住权，向这里事实上进行强行移民以得到扩大势力范围之实。一，如果不能处理好满蒙，日本既无法在国防上保护朝鲜并因此在支那外藩地区不能与英俄保持势力均衡，也就没有办法可以永远对中国政府保持震慑力。何况因为日美条约规定了关于土地所有权事项，¹移民美国一事不得不放弃。能够代之集中移民、使其重新获得土地的只有满韩地区。”

根据他们的推算，满洲南部和内蒙古尚各有可以开垦为水田的土地面积为 200 万町步（共 400 万町步），²可以接纳上百万的移民。据说，第二次桂太郎内阁时已经就这一“先帝（指明治天皇——笔者）遗业”决定进行“满蒙处分”的方针，“如果然如此，国民必将继日清、日俄两次大战中的举国一致的传统，为政府之后援，而政府当局者则应成就此千古的大事业，完成明治中兴的伟业。”〈对支那意见书〉虽然有对最新时局的分析，但是从强调要“将如何处理南满和内蒙古问题作为合并韩国之后制定大陆政策的出发点”上来看，无疑也是受到了川岛浪速关于“满蒙独立”思想的影响。

5. 成为日本倒袁工具的“满蒙独立运动”

借日本国内主张对外事实强硬政策派（对外硬派）声音的高涨，1914 年 5 月，川岛浪速向外务省提交了一份自己口述、铅印长达 53 页的政策提案报告《对支外交失败之真因》（以下简称《失败之真因》）。³因为他认为：“在我看来，革命乱后我国外交，愈来愈多次失败重重”（〈失败之真因〉，31 页），所以在其中对与日本军方采取不同政策、在中国问题上比较注意与国际社会进行协调的日本外交当局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攻击和原因剖析。

1. 《失败之真因》首先批评日本的对中外交过于迁就中国，其中不乏侮辱中国之语：“制造骄妻、狎妾、豪奴、悍婢之根本原因，不外乎主公最初一念之差而丢失治家御人之要。我在支那十余年间处于最了解双方的位置，在我看来，日本的支那外交历来如此。”（《失败之真因》，4-5 页）“支那人好似有怪癖之马，如按一般马匹骑乘，不仅会马上失控，甚至有跌伤之虞。（但日本——笔者）尽管失败再三，至今不能觉悟，而是向错误方向寻找原因，往往按照敌手的借口或假像去努力消除障碍，以为以此迎合对方欢心误解必能冰释，设想对方既已向我倾注诚意，当会圆满解决我方之要求。更有甚者，即使践踏自国的权威与面子也要想法顺从对方意志。然奈何对手绝无诚意，只是更加乘虚而入，其得陇望蜀之欲毫无止境，与注水于无底山谷无异。”（《失败之真因》，5-6 页）

2. 指责日本外交之所以迁就中国，是因为外交当局和外交官不了解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国民中没有如他这样熟悉中国人国民性的。“要而言之，对支外交之要诀即为熟知支那人之性格基

¹ 指美国加州旨在限制日本移民于 1913 年 5 月通过的〈外国人土地法〉，限制日本移民在美国拥有土地和资产。

² 一町步为 9,917.35537 平方米。当时一户日本农民耕地为 5 反（半町步），一户朝鲜农民耕地为 2 町 5 反，而南满洲一户农民耕地为 21 町步。参见〈对支那意见书〉，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30268400，支那政見雜纂 第一卷(B-1-1-2-15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³ 川島浪速述：〈对支外交失败之真因〉，出版地和出版社等信息均未有记载，1914 年。另见〈对支外交失败之真因〉，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30268700，《支那政見雜纂》，第一卷(B-1-1-2-151)(外務省外



础之上驾驭之。”（《失败之真因》6页）“我国官民中以支那通自任者甚多。……然吾人独窃曰：似吾人长久居于可咀嚼支那人性格之境地者稀。吾人自青年时代从事研究支那，数度跨海，居于其地，前后多年，多次扮作支那人徘徊于各省之间，不仅亲历人情风俗，又于义和团乱后常居北京。由十余年间所得支那人观而观之，知前者不过是观支那人性格之皮毛。而因拳匪乱时之历史关系，吾人北京生活之地位竟如准支那人官吏。而彼等于吾人亦不视为纯粹外国人，犹如对待自国一官吏，此与一般所聘用教师或顾问之趣大异。……吾人亦扮作同化，以尽力令其暴露真实想法。上至王公大臣，下到四民，尝试广泛接触社会各层，时而作为上官、同僚、属僚甚至属下，时而作为掌握赏罚升降之全权指挥监督部下、兵卒、学生等大量人等。”（《失败之真因》7-8页）

3，川岛浪速号称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了解到了中国人虚伪、自私、善于交际的国民性，指出包括外交官的日本人，大多因为蔑视中国而被中国人所轻易蒙蔽：“支那人绝对为丧失诚意之人种，妙于虚饰，巧于辞令，冠绝世界。其接人待物不过彻头彻尾虚伪修饰，即其国人之间交际、甚至在父子夫妇兄弟之间亦难流露真情。”（《失败之真因》10-11页）“若是自己可以得到利益，彼等即使持鞭捧履之劳也在所不辞。即使百年仇敌，也可示以不啻于骨肉之忠爱，其亲切周到奉承迎合之妙无有一国可达其域。”（《失败之真因》11-12页）而日本的外交官却“常以自家理想感情推定彼等，提前尽我情谊以候彼等知恩还报，其淳朴律仪之美风不能不令人感动，然最终却不免失望重重，此即我对支外交失败之原因。”（《失败之真因》13页）“称支那人每个人都有外交手腕绝不为过”，（《失败之真因》14-15页）“然而多数日本人视支那人为蠢物，故在一酒宴一赠与一好辞一甘言之下即被收揽，或者是交谈主义议论之际看到彼等做出赞叹敬服之状，即以意为意气投合肝胆相照。”（《失败之真因》14-15页）

4，川岛浪速批评日本人至所以容易被中国人所蒙蔽，是因为只知道看表面。“无论是外交或是国民之间交际，国人重复失败和失望的原因，皆为不熟悉支那人之真面目。”（《失败之真因》15页）对于袁世凯的态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袁世凯在“军事警察教育财政工艺等种种事业中雇佣大量日本人教师”，原因原为义和团事变中中国人对日本人产生了敬畏与好感，其二为“不外是比起欧美人来工资低廉和容易控制”。然而“国人愚直，随喜渴仰之余，视袁世凯为亲日党之神而崇拜之。”（《失败之真因》18页）“如日本领事，因其雇佣大量国人，不足两日，……亦误认袁为肝胆相照之好友，自信只需交臂一谈万事即可解决。”而实际上袁世凯“为支那人中最能将支那人通有之性格才能发挥到极端之人。”（《失败之真因》31页）“革命乱发生后，在其推翻清朝消灭革命党攫取今日地位过程中，我国当局及多少国人，诚心诚意暗助其成，然观其最近言行对我却毫无报德之心。”（《失败之真因》32页）

5，根据对袁世凯外交的失败，川岛浪速进而提出了他所主张的对中外交原则，一是先施威、后施恩，二是一手按剑、一手交欢，时刻摆出不听命即出剑的姿势。“总之，过去那种单纯希望通过迎合支那人感情而操纵之笔法，实是拙之又拙。吾人敢于断言，如此我国外交势必永远难逃劫难，必无成功之时。”（《失败之真因》34页）因此应该学习元和清的做法，“如先施以威，使深感恐怖之后再施以恩，其驯良柔顺也是世界罕见，此即元清诸族能以少数征服并统御多数之理由，已由历史明证。”（《失败之真因》36页）“故对待支那人之要诀为，右手常扶利剑，而后伸出左手对其言语，汝等如愿与我握手，我等亦会应之而不推辞。如不然，我右手之剑马上飞出架于汝首级之上。如能如此，四亿万人中无一人敢不屈从。如右手无剑只求握手，决不能达到目的。日本对支那一直都有锋利无比之利剑，然藏于匣中，一直徒手笑颜求其握手，故常常失败而无转机。”（《失败之真因》36-37页）

6，川岛浪速在《失败之真因》中用了很长篇幅来批评日本人为袁世凯所欺骗利用，而值得注意的是，川岛浪速所提出的制服袁世凯的利剑，居然是他当年所痛恨的中国革命势力和“满蒙

独立”。“近闻有人提出袁疑孙黄流亡滞留显系日本之意。因此感情不和，为圆满进行交涉，应以何种方式将此流亡之徒辈送出国外，以释其误解得以收我权利。然此为无以上之愚见。”（《失败之真因》32页）“清朝末年，为迎合其欢心，我国曾极力压迫孙黄之徒，而得支那一般青年之恶感，因此由留学生在支那全国遍播排日风潮种子，蒙受大害，然无得清朝丝毫感谢。”（《失败之真因》33页）“如孙黄之辈在我国土，虽为无为之书生，然以奇货可居，正是用于外交计略之好材料，并无拼命防止惹袁误解之必要。……满蒙居北京命运死活之枢机，而袁之存亡在于能否于北京进行统治，故要操纵袁必先掌握其枢机。帝国要想收拾早晚势必土崩瓦解的支那之残局，救济四亿万民，履行保全东亚之天职，（在中国——笔者）唯一的立脚点即为满蒙。”（《失败之真因》38-39页）

川岛浪速在该报告的最后，通过前一年春夏之交收到的一位清朝皇族的来信证明他的观点，尤其是对袁世凯看法的正确性。该信以中文写道：“日本政府宜自命为东方主人翁，仗义锄奸，吊民伐罪，不敢大收私益”，（《失败之真因》46页）“对于中国人民，须用金刚怒目菩萨慈心”，“袁所联者米国（原文如此——笔者），对于日本敷衍而已，明眼人当能知之”，“袁世凯对君父为不忠不孝，对国民为不信不义，东西道德皆无一毫。其人历史具在，可详考之，其名不正，何以外交诸公反欲赞成，得无为袁所欺骗乎？”（《失败之真因》47-48页）

这位写信给川岛浪速的清朝皇族，应该就是肃亲王善耆。肃亲王在逃出北京来到旅顺以后，一直生活在日本势力的保护之下，其每月约1000元的生活费用也应该一直由日本军方支出。¹1913年12月17日，川岛访问总参谋部第二部部长宇都宫太郎，提出希望宇都宫能够帮助解决让肃亲王善耆的女儿、其养女川岛芳子前来日本留学的问题。²在神户大学所藏《宫岛家文书》中，也有一封恭亲王溥伟在此时期中通过宫岛大八带给川岛的亲笔信，其中写道：“别后常耿耿不去怀，每晤东友必询近况。……知吾兄肃亲王出亡旅大，赖先生一力保护维持，逊听之余，莫名欣感。此次君○来东归，述先生为本朝竭尽心力、劳怨不○，感激之衷，至于泣下。”³可以肯定，川岛浪速在此期间不仅与住在旅顺的善耆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且依旧在为“满蒙独立”四处活动。

终如川岛浪速所愿，1916年3月7日大隈政权通过内阁决议，正式决定进行倒袁活动。日本政府能够做出这一对中政策的转换，当然首先是不愿看到袁世凯继续掌握中国的最高权力。因为1915年1月18日之后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让日本政府再次感受到袁世凯的反日情绪，因此他们更加希望亲日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派掌握中国的政权。还有一点原因就是，他们看到了在前一年的12月12日宣布称帝的袁世凯在护国战争的打击下已经是日暮途穷。按照栗原健的说法，实际上从一月开始，在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的主导下，由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军令部的有关局长、部长参加，每周一至两次开会交换情报、研讨制定日本政府对中政策。对中政策分为满蒙方面、山东方面、上海方面和南方方面四个部分，按照日本政府内阁决议中提到的“金钱问题”，决定由大仓喜八郎向满蒙方面的肃亲王善耆提供100万元，其他方面由久原房之助分别向岑春煊提供100万元、向孙中山提供50万元，之后再向孙中山、黄兴和陈其美各自提供了10万元。⁴而按照波多野胜《满蒙独立运动》的说法，内阁决议之后第三天即3月10号，久原房之助的“久原矿业”就与孙中山签约提供了20万元的借款，而孙中山的条件自然就是将来向久原矿业提供中国矿产资源的开发权。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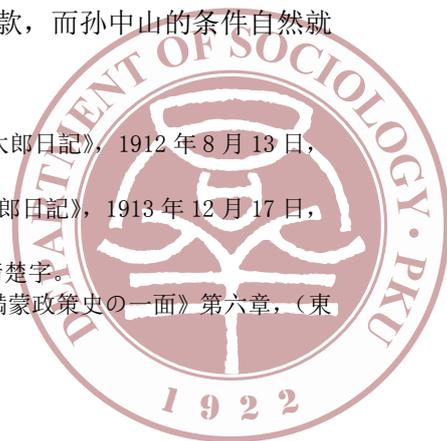
¹ 宇都宫太郎関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2—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2年8月13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138頁。

²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2—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913年12月17日，（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289頁。

³ 〈恭親王より川島宛〉《宮島家文書》，神戸大学借用番号1-40-d。○为不清楚字。

⁴ 栗原健：〈第一次・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と小池外務省政務局長の辭職〉，《對滿蒙政策史の一面》第六章，（東京：原書房，1981年），第147-148頁。

⁵ 波多野勝：《滿蒙獨立運動》（東京：PHP研究所，2001年），第155-156頁。



川岛浪速的“满蒙独立运动”也因此终于迎来了转机。在得知日本政府政策发生变化以后，川岛浪速等人立即开始行动。但是因为贡桑诺尔布已于1912年9月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出任了北京政府的蒙藏事务局总裁，所以川岛浪速计划中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的蒙古人力量、即运动的军事力量的主角，变成了潜伏在达里诺尔湖（盐湖）一带的“蒙匪头目”巴布札布。巴布札布原是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人，后全家迁至奉天彰武县。黑龙会常务干事葛生能久所著、1935年出版的《东垂先觉志士记传》（中）如此描绘巴布札布的生平：因为家乡常常受到马贼的残害，青年巴布札布为了“挫邪助正”故意投入马贼，“以其勇猛大胆和理智清晰”而“马上成为一方头目，响彻蒙古边境地带。”正好赶上日俄战争，在日军“特别任务班”招募时投入“满洲义军”，因为立下“显著功绩”，战后被日本军方推荐为彰武县巡警局长。但是“霸气郁勃”的巴布札布不甘心一生只做一位行政小官吏，辛亥革命爆发后看到清王朝的没落，“对清朝抱有忠诚之情”的巴布札布毅然率领36名亲信参加了“外蒙独立军”，被任命为“东南方面军”的司令官，活跃于经棚（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所在地）、林西和多伦诺尔（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下辖的一个乡镇，清代康熙举行多伦会盟处）地区，被称为“常胜将军”。然而看到外蒙听命于俄国，撤销独立，与民国政府达成“自治”的协议后，又与外蒙脱离关系，独自活动在内蒙古东部西乌珠穆沁旗附近的达里诺尔湖一带，以贩盐为财源进行练兵和等待复兴清王朝的机会。¹

但是，根据1916年3月27日当时奉天满州铁道公所提交的报告，巴布札布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马贼”和“蒙匪头目”而已：“蒙匪头目巴布札布，曾为开鲁县之一小官吏。当年札萨克王逃亡外蒙时，彼亦加入行列举起叛旗，成为一名蒙匪的军官，其实不外乎是一位并无任何学识的野蛮的普通的马贼，如果认为他是一位主张内蒙独立的具有政治卓见之士那就完全是一种错误。”“怀柔巴布札布是袁世凯最费苦心的一件事”，最终派遣与巴同为土默特左旗人、为巴所信赖的玛哈尔巴萨尔与巴布札布谈判收编。对于巴布札布提出了7个条件和6个附带条件，“中央政府认为要求过分，虽其中一半可以接受，然其余的各条如不加以修改则难以接受。”如认定兵员为5000人，拨发武器5000枝，不顾其他蒙古王公利益划分驻防地域等，加上南北战事，谈判遂未再继续。²而日本外交史料馆中所藏当时的一份报告书——〈蒙匪讨伐状况〉则说：“蒙匪头目巴布札布，据说原为土默特旗之五品顶戴蓝翎巡官，又据说原为宾图王旗或喀喇沁旗的喇嘛僧，转而投入马贼，势力渐大，跋扈于东南内蒙古地界，后又进入锡林郭勒盟各旗，麾下号称万人，初次南下即陷林西，进出多伦诺尔，遥遥威胁北京。虽其最终目的是在普通匪贼式的劫掠抢夺，还是在摆弄锋镝、任侠骁勇于乡关，还是在通过反抗袁政府达到何种政治目的尚且不清，但至少可以看出他现在是同时三者具备。”³

按照《东垂先觉志士记传》（中）解释，巴布札布之所以同日本方面建立起了联系，是因为巴布札布“与中国军队屡屡交战，但因交通不便的边境地区无法补充武器弹药，一时退至哈拉哈河地区，同时为了充实兵力岸，遂向多年信赖的日本方面求援”，通过居住在海拉尔的日本人宫里好磨派遣了两位部下于1915年6月间偷偷来到了日本。但是，因为当时的日本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又通过大原武庆找到了计划满蒙独立活动的川岛浪速。川岛等人决定进行对其支持，11月间派遣当年曾经帮助孙中山在东京建设军事学校“浩然庐”的预备役骑兵大尉青

¹ 〈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上），葛生能久：《東垂先覺志士記傳》中，（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5年），第625-627頁。

² 〈奉天滿州鐵道公所開申蒙匪頭目巴布札布懷柔策ニ對スル政府ノ苦心ノ件〉，大正五年三月二十七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4018113300，公文雜纂・大正五年・第三十九卷・建議・建議（国立公文書館）。

³ 〈7 蒙匪騷動ニ関スル報告〉（第壹篇），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50693500，〈蒙古ニ関スル事情密偵一件〉（B-1-6-1-46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柳勝敏¹等人前往巴布札布處考察，青柳勝敏在與巴布札布約定進行援助之後於12月底返回了日本。²

而1916年3月27日奉天滿州鐵道公所報告稱，當時到北京出差的滿鐵職員得知，瑪哈爾巴薩爾回到北京後報告說：“巴伊如國王般地接受部下禮拜，一身霸王之氣，其部下中既有擅長文筆的漢人，還看到有數名日本人各自攜帶妻子居住於此。據巴本人所談，已經同日本進行談判，當會接受其提供的武器與軍費，但武器如利用滿鐵運送自然有被支那官憲發現的危險，因此同東清鐵路進行交涉，準備在浦鹽登陸後運送到滿洲里的停車場，在當地進行交付。”³從此時間上可以判斷，在此之前已經有當地的日本馬賊、也許就是薄益三等與巴布札布建立了聯繫。現藏於日本防衛研究所、由當時青島日本守備軍司令官大谷喜久藏於1915年給陸軍大臣的〈軍官處刑〉報告證實，薄益三在1915年初即已經帶領其弟薄守次等15名日本人（其中有日軍軍官），開始為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準備軍火武器：“薄益三在1915年1月下旬受宗社黨頭目趙贊天和于海川的指令，以復興清朝為目的，在黃縣（青島一筆者）地方發起革命之亂，……前往大連並在當地購買步槍一百七十支，子彈四萬發。”⁴宗社黨在青島發起革命一說，應該是青島軍方沒有搞清事實而產生的誤解。

在日本政府改變了對袁政策以後，大量的日本現役和退役軍人、以及日本大陸浪人進入到“滿蒙”地區，分別形成了旅順的總部（肅親王和川島浪速）和巴布札布軍中的指揮部（以陪着肅親王第七子憲奎來到這裡的青柳勝敏為首）。按照《東亞先覺志士記傳》所列的名單，僅在巴布札布軍中的日本人就達51人之多（其中22人為預備役軍官），肅親王變賣財產通過川島浪速等人在日本購買的軍火也經由這些日本人之手陸續運送到了巴布札布軍中。⁵由於第廿七師師長張作霖態度不明，為了排除障礙，日本浪人們於5月27日組織了對張作霖的自殺性襲擊。但是內田良平在6月1日從沈陽給外務省發去電報，又建議“由張作霖提出，將長城以外即滿蒙地區從中國分離出來，在宣統帝統治下獨立。”⁶

1916年6月27日巴布札布軍打出了“勤王師扶國軍”的旗幟，7月1號開始南下東進。然而，按照中間立夫的見解，這是一場從一開始就注定不會打贏的戰爭。因為巴布札布之所以出兵，不過是因為自己突然遭到日本拋棄，而對日本做出的一種示威行動。⁷因為護國戰爭迅速得到全國各地響應，袁世凱雖然被迫於3月21日取消了帝制，但是反對袁世凱的呼聲卻沒有因此消停，失意的袁世凱於1916年6月6日突然死去。日本政府因此宣布支持黎元洪新政權，在中國剛剛開始的倒袁運動因此又被日本政府再次緊急叫停。面對巴布札布的軍事行動，日本政府只好嚴令當時在旅順的川島浪速趕往前線郭家店（今天吉林省梨樹縣境內）親自迫使巴布札布退兵。10月6日，退兵途中巴布札布軍與一直跟蹤追擊的熱河都統姜桂題⁸帶領的毅軍遭遇，巴布札布本

¹ 關於青柳勝敏當年幫助孫中山在東京建設軍事學校「浩然廬」的過程，請參見趙軍：〈辛亥革命をめぐる日本民間の動き—青柳勝敏をはじめとする軍人グループの活動を中心として—〉，王柯編：《辛亥革命と日本》（東京：藤原書店，2011年）第54-80頁。

² 〈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上），葛生能久：《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5年），第627-630頁，625頁。

³ 〈奉天滿州鐵道公所開申蒙匪頭目巴布札布懷柔策ニ対スル政府ノ苦心ノ件〉，大正五年三月二十七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4018113300，公文雜纂・大正五年・第三十九卷・建議・建議（國立公文書館）。

⁴ 〈將校處刑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3022383300，《密大日記》大正4年4冊の内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⁵ 〈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上），葛生能久：《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5年），第631-636頁。

⁶ 〈1 內田良平發電報〉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30271600，《支那政見雜纂》，第二卷（B-1-1-2-15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⁷ 中間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年），第217頁。

⁸ 〈第九號 / 巴布札布部下招撫ニ関シ八月二十五日姜桂題氏ヨリ中央政府ニ送レル電報〉，JACAR（アジア歴史



人也中流弹身亡。

不仅如此，此后日本外务省还通过军方，反复命令参加了这次行动的日本人迅速脱离“蒙匪”乃至“宗社党”。¹“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就这样再次收场。中间立夫从巴布札布的生涯和他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对于巴布札布所追求的根本不是“满蒙独立”的结论：“对于他来说，只有内蒙古的独立，才是第一义的问题”。²第一次和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中的蒙古族，都只不过是川岛浪速当做了实现“满蒙独立”的工具。而更重要的是，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川岛浪速所醉心的“满蒙独立”及其所发动的这两次“运动”，对于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来讲，也不过是他们干涉中国的一个工具，一颗可以随时抛弃的棋子而已。

所谓的“满蒙独立运动”虽然消失了，但是参加过“运动”的日本人却并没有将对“满蒙”纳入到日本的势力范围放弃幻想。直到1925年时薄益三等人还留在赤峰和林西一带，但是这时他们却是借着和蒙古王公合办农牧业开发产业的口号在活动。³日本当年对“满蒙”地区产生兴趣的原因就是向这里移民和开发这里的矿产资源，在1910年时就有日本人到“吉林蒙古一带查勘一切，籍近侦探。”⁴中井喜太郎在他于1913年12月15日个人向日本外务省提出过一份《关于满蒙之意见》，为日本政府设计了“矿山开掘权获得案”、“森林伐采权获得案”、“南满铁道事业扩张案”和“东蒙古王公怀柔案”等纳满蒙进入日本势力范围的方法，而其中的《东蒙古王公怀柔案》就是针对东部蒙古地区的荒地开垦权和矿山开采权：共和以后，东蒙古王公因为失去了清朝时代的经济补助而财政贫乏，王公们羡慕朝鲜国王每年能够从日本得到巨额的补助，因此也曾派人暗地调查金州半岛（辽州半岛）的中国人生活情况，希望能够以荒地开垦权和矿山开采权为抵押，藉助日本势力保全王公地位和得到能够安泰生活的补助费，而在北京的日本人其实已经以荒地开垦权和矿山开采权为抵押向其贷款，所以日本政府可以通过在满洲的日本银行对他们进行贷款。⁵

其实东蒙地区的蒙古王公们很早以前就有以土地作抵押以换取日本支持的想法，所以，但年川岛浪速所说的“与巴林王之间以其管辖内的矿山开采权为抵押借款一万两”，“与巴林敖汉等昭乌达盟十一旗之间签订特殊密约之事已经接近成功”的说法绝非是空穴来风。1914年4月敖汉旗苏亲王与日本人的谈话中也直接说出了这一想法。⁶1915年5月11日，“十年以来蒙古巴林王教习”（原文如此）的片谷传造搭乘“哈尔滨号”回到日本，在神户登陆时对记者们谈到：“本次日支交涉中如何获得在东蒙地区的利权是我政府最为棘手的问题，但是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该地区与其说是资源丰富，毋宁说是在国防上处于最为枢要位置，所以为了国家百年之计和建设东洋和平之根基，即使放弃一些山东方面的利权也必须要收入我手。同时，该地资源之丰富可谓别无可有，只要政府如当年东拓（即以移民和殖民地开发为主要内容的“东洋拓植”——作

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130394100, 《外事彙報》，大正5年度(B-政-8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¹ 〈宗社党及至蒙匪關係邦人取締に関する件〉,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03022426000, 大正6年《密大日記》, 4冊の内4,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蒙匪中より日本人引揚方説論の爲め海拉爾出張に関する復命書進達の件〉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3022426100, 大正6年《密大日記》, 4冊の内4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² 中間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2013年), 第219頁。

³ 《蒙古農牧事業關係雜件》第一卷〈6. 博王府対中日農業及商事合併經營ノ件〉,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1157600, 《蒙古農牧事業關係雜件》, 第一卷(1-7-7-00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⁴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全宗》〈日本在長春府城內秘設關東都督府派出所並有日人至吉林蒙古查勘偵探希酌辦見復由〉, 宣統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四字三百六十號。

⁵ 〈中井喜太郎ノ滿蒙ニ関スル意見〉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30268500, 《支那政見雜纂》, 第一卷(B-1-1-2-15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⁶ 〈秘第一八号, 谍第五百六十二号〉, 5 大正3年2月24日から大正4年8月28日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50169300《各国内政關係雜纂》/支那ノ部/蒙古 第三卷(B-1-6-1-14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者)那样设立特别设施进行开发,或者是补助有志的资本家着手此类事业,现今一平方海里人口只有两人的这片土地,吸收500万人的移民也并非难事。何况,这里的人即使对我们还没有产生感情,也绝不会像他们对待支那人那样坏,事业定能顺利起步和发展。”¹

片谷之所以敢于说出这种话来,说明他明白蒙古族王公的这种做法的背后,隐藏着借日本力量摆脱中国的目的。对于这一点,民国政府当然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在民国九年,即1920年6月时他们借着一封顺直省议会的电报开始大做文章:“天津顺直省议会来电,民国九年六月二日大总统国务院钧鉴,近闻蒙古王公私借日债,擅以蒙地做押,事如属实,丧权辱国莫此为甚,务恳严为查究,以弭外患。”²

这件事当然绝非小事。国务院将这件事立即交给了外交部。³但是外交部处理这件事的方法却很蹊跷,他们以无法得知“债券方面究系何等日人”为名,不去向日本方面直接提出交涉,而是将此事又推给了内务部和蒙藏院:“惟上述消息,关系土地主权,至为重要,极应设法侦查,如果属实,应即劝令蒙古王公迅速取消此议,以免发生重大轆轤。”⁴内务部在借到国务院的命令后,6月25日特地发文:“查顺直省议会电称各节,关系我国土地主权至巨,极宜切实查明,如确有押借情事,即饬赶紧取消。一面对于蒙属各处更应一体严行晓谕。不得再有此种行为,以免酿成巨患。”⁵从国务院发给外交部的〈国务院公函第一千七百八十五号〉来看,到了8月时,他们已经察觉蒙古王公确有此类行为,且目标渐渐集中到了昭乌达盟。⁶然而有趣的是,这件事情到了最后,被推到了当时担任蒙藏院总裁的贡桑诺尔布的面前。贡桑诺尔布虽然不是来自昭乌达盟,但是昭乌达盟的巴林旗、敖汉旗的王公却都是当年在他的率领下参加了“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的盟友,而他们当年也正是以农地开垦权和矿山开采权换取了日本支持他们的“独立”活动。聪明的贡桑诺尔布,立即行文回答“由本院照会昭乌达盟长,严密侦查,无稍回护,如果属实即应赶紧取消。”⁷民国政府如此做法固然有其理由,然而是否同时还有其他的目的,明眼人当是不言自明:当年日本与蒙古民族之间的关系,也远非是由于日本的侵略野心这样一句话就能够完全说清的。

结 语

后来的事实也说明,日本政府和日本占领当局从来就没有过统一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使其实现独立的打算。森久男指出,满洲事变之后东部内蒙古地区曾经出现了要求内蒙古独立的活动。甘珠儿扎布和正珠儿扎布建立的“蒙古独立军”一时还得到了关东军的支持,领取了3000支枪支和20万发子弹,其后又以本文前边提到的松井清助(此时为退役大佐)等为顾问。在1932年

¹ 〈東蒙に移民せよ〉,《大阪朝日新聞》,1915年5月12日。

² 〈蒙古王公私借日債事〉(發文者國務院,收文者外交部),《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號:03-32-191-04-015,民國9年6月(1920年6月)。

³ 〈蒙古王公私借日債以蒙地作押〉(發文者國務院,收文者外交部),《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號:03-32-145-04-010,民國9年6月(1920年6月)。

⁴ 〈蒙古王公私借日債應設法偵查如果屬實即勸令取消此議〉(發文外交部,收文者內務部、蒙藏院),《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號:03-32-145-04-011,民國9年6月(1920年6月)。

⁵ 〈蒙古王公私借日款事〉(發文內務部,收文者外交部),《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號:03-32-145-01-015,民國9年6月(1920年6月)。

⁶ 〈准色旺紮布等電稱報載熱屬蒙古王公暗將昭盟荒地私賣決不承認等語函送查核〉(發文國務院,收文者外交部),《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號:03-32-145-01-016,民國9年8月(1920年8月)。

⁷ 〈蒙古王公私借日債事已照會昭烏達盟長嚴密偵查如果屬實應即取消〉(發文蒙藏院,收文者外交部),《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號:03-32-145-01-017,民國9年8月(1920年8月)。



3月的满洲国成立前夕，内蒙古东部的蒙古族中还有人提出了分别建立满洲与蒙古两个国家，然后由两个国家共同构建成“满蒙独立国家”的建议。然而由于担心在新国家——“满洲国”内引起民族对立，“2月18日，在（满铁中数一的蒙古研究家，满铁郑家屯公所长）菊竹实藏的指导下，在郑家屯召开了东部内蒙古各旗代表会议，通过了东部内蒙古的蒙古族参加新国家的决议。”“‘蒙古独立’被降为‘蒙古自治’。作为满洲国建国理念的‘五族协和’并不单单是一个美丽的辞藻，其实包含着否定蒙古族独立的深意。”¹

被并入了满洲国的内蒙古东部，最后不过是成了满洲国的兴安省。而针对热河省内的蒙古族的动向，关东军参谋部在1933年10月26日的报告书中还在指出：“热河省内的蒙古人知识分子中有认为将蒙古民族联合在一起实现蒙古独立，这一点应该引起吾人注意。”“如果不客气地说，蒙古人只要是在日本的统治之下会高兴地服从。”当年的9月8日和9月11日，在承德的日军师团司令部会议室里，先后由关东军承德特务机关和热河省公署主持下召开了“蒙古王会议”，并形成了〈热河省蒙旗会议决议〉，其中第一条即为：“一，热河的蒙民为构成满洲国之一分子，永久对满洲国尽忠节。”²

1936年1月，由“锦州省公署旗务课”五岛德二郎写给军方的一份政策提案报告〈关于热河省、锦州省管下蒙旗处理的考察——处理蒙古根本方针考〉则更加明确地指出：“如果蒙古工作妨碍了支那工作，无论是什么时候都应该被放弃。”“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如果说到『支那工作』、『支那四亿工作』当然要包括察哈尔。或者是谈到支那主权，那么支那的主权究竟是指什么呢？单从文字上来看，这一点就非常抽象笼统。主权是复兴亚细亚运动至高无上的内容，做到了这一点就等于说已经取得了亚细亚的复兴，因此主权论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现实论，所以将蒙古工作作为牺牲品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此谁都不会提出异议。”³也就是说，包括当年的“满蒙独立运动”在内，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等边疆地区的所有工作，说到底不过是为进一步侵略整个中国的目的而服务的。

¹ 森久男：〈蒙古獨立運動と滿洲國興安省の成立〉，日本現代中國學會《現代中國》第73號，第102—106頁。
² 〈閩蒙報第78号 熱河省より見たる蒙古民族に就て〉，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30468400，熱河省より見たる蒙古民族に就て(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³ 〈熱河省、錦州省管下蒙旗処理ニ関スル一考察——蒙古處理根本方針考〉4. 国外蒙古獨立論(チャハル蒙古獨立論)，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3021529900，熱河省錦州省管下蒙旗處理に關する一考察—蒙古處理根本方針考—，康德3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